

炎黄春秋

第 **4** 期
2007年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陈独秀晚年重新认识民主主义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贪官与名画

目 录

沉思录

- 1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陆 德
7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
——半个世纪后的思考.....白 琳

一家言

- 12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江 平
14 劝君少颂秦始皇.....王也扬

求实篇

- 16 陈独秀晚年重新认识民主主义.....尹振环
19 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插曲”.....夏永安
22 为争取读书机会引出的离奇经历.....张玉钟

怀人篇

- 26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王 龙
35 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陈 健
41 陈老总落难石家庄.....赵淮青

往事录

- 45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张家康
51 “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戴澍霖
53 北平《解放》报往事.....孟中洋

遗闻录

- 59 许世友和他的三任妻子.....王春华
62 “中国的端纳”.....裴毅然

品书斋

- 64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言.....李 锐

春秋笔

- 66 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戴 煌

亲历记

- 74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韦 顺
76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余明华

古镜台

- 77 贪官与名画.....王春瑜

编读窗

- 79 读者来信摘登.....张国凤等

本期执行主编 杨继绳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 陆 德

编者按：由陆定一同志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一共十部分，这十部分的标题是：一、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二、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三、对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六、对自由、民主的认识；七、共产主义事业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过去理解得过于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九、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宗”理论的第三条路，来创建自己的改革发展模式；十、最终遗言。经作者同意定稿，本刊先摘发其中五部分，以飨读者。

前 言

2000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新闻定义”、“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达22年），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又是被海外舆论界广泛称之为的“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派”。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我将他的部分讲话和谈话，进行了汇总和整理。父亲虽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和提法，我认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and 现实意义。

现把父亲的部分反思内容，呈献给大家。

陆 德

2006年11月17日

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

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这是正确的。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不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

恩格斯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才是伟大的党。不要怕（周）总理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却是最高。

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是结束。一个结论的是否正确,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

——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报总编秦川的回忆文章说:1992年陆定一生日那天,对前来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讲:“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此时专政的职能,主要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贪腐问题。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加外力)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

“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就越需要用外力。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

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

——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

——在“社会属性”方面,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应看其政治表现,而不应以思想划线。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为”、“无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

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双百”方针,从字面上好理解,但要从理论上理解,恐怕首先要分清是用“二元论”来解释还是用“一元论”来理解的问题,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这么两个问题。

对于“双百”方针,我认为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主席支持百家争鸣,但后来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同样,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

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总理的主张,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的“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就像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列宁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裂变、聚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



毛泽东和陆定一(图中中央戴眼镜者)在交谈



1945年,毛泽东和邓发、陆定一、王维舟、聂荣臻、周恩来在中共七大期间

“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

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的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我提的报告(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

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的。

当时,我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我。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表现问题,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

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我曾问父亲: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陆答: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融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艺术领域,能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摘自陆定一为“双百”方针3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注: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二元论”的解释,以及对其中“有为”、“无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观点等,有详细的论述。请查阅《对父亲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中“二元论”思想的回忆和整理》等文章。

对自由、民主的认识

——“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

价值部分;

——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宿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你看过西方“行为科学管理”对人的需求分析吗?(答:看过。有分5级的,有细分7级的,但以5级为主。)它说明人的需求,不仅是单纯对物质的需求,那只是低两层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层,是人对社会和精神的需求,是对人生、价值和自我表现的需求。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类自由的追求,从来



50年代末,陆定一在中南海家中

未被轻视,也从来未敢放弃。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来索求和达到的呢?研究马列的著作和他们的思路,他们不是通过“毁灭”和“抛弃”,而是通过“扬弃”。它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彻底砸烂旧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采用“否定”和“砸烂”,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

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论述“自由”的认识,也是我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不同之处。

马克思的“自由人”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扬弃中发展来的,而且,在未来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义价值”部分。

马克思是从研究古希腊哲学、民主建制、德国哲学和宗教,以及英国、法国的政治和唯物主义影响等方面入手,研究他所称之为的“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从他研究的理论依据中,可以看出,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基础的。而后者(理论)则是用作对前者的批判和扬弃,即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传统的“自由主义”,由于长期处于私有制社会环境,故它的核心原则是“自我”。即“自由”是受个人自我利益的驱动,而在法律限定条件下的自由飞翔。马克思认为,这是私有制下对自由的核心原则。此时,人类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素质,解决人与社会和自然界异化的矛盾,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核心原则。这种自由,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是涵盖了自由主义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共产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核心价值原则。在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中,起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与表达共产主义的“公有(集体)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故它对传统的自由及价值,是一种“扬弃”,而不是“取消”。百多年来,在理论界,还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可以去驳倒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所以,自由、平等、博爱,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它的“专

利”。共产主义社会也包含着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进步、更高级的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每一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一种制约的关系。单纯强调“一个人的自由”,他要杀人放火的“自由”,就没有了“一切人的自由”。

至于“自由化”的问题,“自由化”说到底,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无限度地放任自由。对于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反对它,资产阶级也是反对的。他们(注:指资产阶级)对自由有许多潜规则,并不是无度的。“自由主义”我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懂”,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对它的论述和界定。

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且这一口号也能团结、争取更广泛的人,有广大的统一战线;第二,应该加以科学地解释,是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初,父亲陆定一病危。在父亲临终的前两天,儿子和孙子陆健健、陆继朴去探望临危状的父亲。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第二天,父亲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

5月9日凌晨5时45分,老人停止了心跳,离别了人间。

(注:由于我不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仅是个科技型干部,故在整理父亲谈话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有不准确的地方,望能予以指出和纠正,以使父亲的反思准确到位,达到研究的目的。)

2006年11月17日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杨继绳 杜明明)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

——半个世纪后的思考

· 白琳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始用10到15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11月,他说,要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月24日,向全国宣布了这条总路线。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这条总路线。1953年是“一化三改”正式开始的第一年。1981年的党史《决议》把1949—1956年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但在被称为新中国“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中却没有写社会主义。毛泽东当时说法是:大概二三十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原来说的建国后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或二三十年才能开始的“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却在三四年后就开始了。虽然这条总路线的实质被称为“发展一体改造两翼”,但实践中的实质是“改造两翼”,即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一体”即工业化仍然未完成,但过渡时期总路线早在1956年后就不提了,因为“三改”已完成了。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在1988年之前很少有人公开怀疑。1981年的党史《决议》认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贯彻这条总路线的实践——社会主义改造,《决议》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础上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这是党中央在当时认识水平上所作的结论,不可能没有局限性。

中共十三大后,一些著名政治家和学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开始公开怀疑。资深老政治家薄一波在1988年3月19日的中顾委会议上提出,为了加强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要重新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的历史。“新民主主义社会搞得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会更好”?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搞15年到20年是不是会更好?毛泽东在“八大”后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搞私营,可他没有去做。“为什么对于事先提出、制定的本来是正确的符合实际和符合国情的一些设想、方案、政策和路子,往往不能贯彻到底,中途就被改变了呢?”应“进一步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薄老提出的这个思想确实很重要。于光远在1988年5月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中指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批评……实质上是批评了毛泽东自己创立和在多年中有所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薛暮桥在1988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说:“现在来看,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1996年7月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重申了这个观点。1998年《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胡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1999年该刊发表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胡绳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界限,找到了正确道路。令人遗憾的是建国后毛泽



天津市青年资本家组织三千人的报喜队,他们高呼:“坚决服从领导,服从分配,不抽逃资金,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东很快放弃了其正确思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党“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走了弯路。1953年,中国大陆并不具备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条件。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十三大后,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之所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直接的根源是十三大报告对私营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做了明确阐述:“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翌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合法

权益及发展做出了宪法规定。至此,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又进入合法发展的阶段。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个世纪后,我们重新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结果,需要认清以下基本问题:

一、建国初期政权稳定后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党的工作重点应在何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现在人们比较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及斯大林对其的继承和发展为指导的。但关于党的工作重点的认识,毛泽东与列宁和斯大林是有重大不同的。1918年3月即十月革命胜利后四个多月,列宁就指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

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他特别强调:“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2、168——169页)但苏维埃政权刚刚着手把根本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就被历时3年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打断了。1920年4月7日,当国内战争还在进行、但已接近尾声时,列宁就提出:“当前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从迄今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的军事任务向和平的经济建设任务转变。”(同上,第38卷第328页)同年12月22日,国内战争结束刚一个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46页)两年后他提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

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同上,第777页)斯大林在1921年7月说:“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2页)根据以上论述和苏俄历史的实际,可以肯定,第一,苏俄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前夕就开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完成了这一转变,没有这一转变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战略性转折。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在何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苏俄的历史回答是:一旦巩固了新政权、消灭了敌对势力的武装反抗,实现了和平局面,就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又说,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工作重点即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的不一致被有的党史学者称之为“二元论”,因为这是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并重。把总路线比喻为

“一体两翼”,意味着“工业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如能坚持到底也不错。但正如有的学者说的:“总路线提出后的客观印象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淡化了经济建设”,“阶级斗争越来越置于经济建设之上”。(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

开拓》1996年版第175页)正是在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不久,毛泽东于1953年11月4日实际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这种以两个主义、两个阶级、再加上后来说的两条路线为纲的思想及其实践,使中国的现代化被耽误了20多年。直到1978年底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工人阶级政党掌握全国政权后,确定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角度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党中央确定国内主要矛盾的角度是社会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状况,因而确定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列宁在确定过渡时期和平状态下的主要任务时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1953年后毛泽东一直从阶级斗争和权力在谁手中来确定主要矛盾,就始终未能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到底对否?

50年来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在经济很落后的条件下彻底消灭私有制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时间上看提得过早。不论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



太原市组织手工业者举行庆祝合作化游行



1956年初,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初级合作化,图为北京市郊区县南皋乡举行转高级社庆祝大会

其积极作用也远大于消极作用。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看,它也是有明显缺陷的。1951年2月,刘少奇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却没有民主化这一内容,这是个全局性的缺陷。1981年的党史《决议》明确指出,“建国以来没有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不仅是提前消灭了私有经济,而且是不再把民主作为一个重要建设目标。1954年制订宪法时似乎重视了一下民主法制,但宪法公布后并没受到重视,从1955年开始,不断出现大小冤假错案,直到1978年。因此,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耽误了20年,而且使民主和法制建设也耽误了20多年。

三、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基本路线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标是建立社会

主义社会。按照“一体两翼”之说,应当以工业化为主体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在贯彻总路线的实践中,实质却变化了。总路线提出后不久,毛泽东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他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抓社会主义改造。他本人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工业化这个主体在实践中并未成为主体。社会主义改造用三四年就完成了,但直到毛泽东告别人世,中国大陆的工业化之路仍不知有多长。这种忽视民主化又放松工业化、急不可待地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从体制框架和基本结构上看,无疑是斯大林模式:

一大二公,容不得非公有经济;指令性计划经济扼杀市场和竞争机制,地方、企业和个人失去自主经营权;党政企不分,党几乎代办一切的党国制度;权力高度集中,全国集权于党,党集权于党委,党委集权于一把手书记,全党集权于最高领袖,实质上是邓小平所批评的“个人领导”;容不得持不同意见者,往往将其打为反党或反革命集团,思想文化定于一尊。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了。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1955年为4.7%,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下降为2.5%。

四、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17世纪以来,全球历史发展最强大的潮流或最无可争议的规律性趋势就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定义至今仍未统一,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则基本上是公认的。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进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和专制制度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综合性过程和目标,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多领域多方面;具体表现为科技先进化、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或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世俗化、社会阶层及其成员流动化、大众知识化、言论和出版自由化、

社会保障化、人口生育控制化等等。由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属于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范畴,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只有顺应现代化才能是走向成功的社会主义。

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就在于这次会议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摒弃了长达25年之久的“阶级斗争为纲”。不仅如此,这也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次成功地把中华民族的注意力长久地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因此,这次全会不仅在中共党史上、而且在中国现代化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或分水岭的巨大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关系是:社会主义及其具体形式必须顺应社会现代化。一大二公、高度集权、扼杀民主和轻视教科文的社会主义被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市场经济为机制竞争发展,重视民主法制和实施科教兴国的社会主义所取代,是由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所决定的。

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现代化为主题后,仅仅拨乱反正、恢复到马列等老祖宗设想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显得不够了。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要创建一种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就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2页)这次全会后不久邓小平说:“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同心同德地实现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162、208—209页)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33页)1987年他高度概括地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3卷第259页)以上论断足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适应现代化要求、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

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一直没有统一的绝对的标准。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还批判过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并非都是好的。民粹主义也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时至今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据说已超过500种。中国在形成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其他主要领导人所效仿的唯一的正宗社会主义样板就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20世纪末中国经过14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中固守唯一模式的人大概为数不会多了。那么新民主主义实质上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呢?1998年冬,薄一波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时说:“今天看来,1949年制订的《共同纲领》不仅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实际上也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别是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人民日报》1998年1月23日)1987年十三大确认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领导力量、政党制度、国体、所有制成分、指导思想是相同或相近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力水平不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个体经济比重很大,几乎没有外资。共产党执政与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两者间的最大共同点。30多年后人们又重新研究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个体和私营经济死而复生,一大二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20年,不仅耽误了现代化,而且出现两场大灾难达十三四年之久。如果把新民主主义也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让其按现代化规律长期发展和完善,中国大陆的经济与世界相比差距就不可能像70年代末那么大。虽然这只是假设,但非公有经济的死而复生和迅速发展,足以发人深思: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持久生命力的?一大二公、高度集权和扼杀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坚持了50多年最终垮了,它被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竞争发展的市场经济与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所代替。一大二公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坚持了不到30年,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竞争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所代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江 平

我们在研究法律制度建设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我将它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前提”、“一个核心”和我理解社会主义应该包括的“三个层面”。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才能明确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三个前提 我们要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个前提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我们以往倡导的传统的苏联模式,说它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也好,失败也好,现在都不是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的东西,这一点大家都理解。我离开苏联整整50年,今年我下决心自己再回去看看,正好赶上了导致苏联最后垮台“8·19”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看着红场上纪念“8·19”的人们,打着红旗的人稀稀拉拉,不到200人,作为旁观者,我们都有感触,一切都时过境迁、物似人非了。而在俄罗斯现在的报刊上更多地还是引用总统普京的话,谁要是不为苏联的瓦解而痛心,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是再回到原来的制度,谁就没有头脑。我想这可能是俄罗斯人民的普遍想法,既为过去苏联的瓦解而痛心,但是决不愿意再回到过去。我们国家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摸索,可以说,任何以原来的路子为模式来批判今天的做法都是落后的,都是保守的,如果我们怀着改变或克服社会主义的缺点和不足的愿望来使它更加完善,才是改革。

第二个前提是我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是多元的,谁也不能垄断。过去我们批判说北欧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虚假的、不科学的,斯大林连铁托的社会主义也认为是虚假的、反科学的,但是究竟哪个更正确呢?其

实,苏联瓦解后曾有人总结,苏联瓦解的最根本原因是“三个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党的权力垄断。这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三个前提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社会主义。今天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革命形势,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看法,因为如今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原来传统的资本主义,它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两种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谁也没有消灭谁,谁也没有把握去消灭谁,结果是并存、共同发展。它们不仅并存还相互借鉴。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改变了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吸取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绝对、片面的社会主义形式。在这个层面说,从资本主义里吸收到某一些好的方面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应该是反动的,不应该是错误的。我们有了这三个前提,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来探讨怎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个核心 探讨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这就是一个制度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拿苏联和东欧来说,东欧社会主义有40多年历史,而苏联有70多年,为什么一项制度维持了40多年、70多年最后都不能坚持下去呢?因为人民最终抛弃它了。一个社会制度最终还是靠人民来选择。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那么人民就会拥护这个制度,如果制度不能为人民带来利益和财富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他们就抛弃。记得胡耀邦同志说过,老百姓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他就拥护谁,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家最朴素的话,老百姓拥护政党主

要不是靠意识形态，主要不是说你的理论有多好、纲领有多好。如果一个制度长期不被人们接受，那么必然要改革，不改只有失败。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究竟为人民带来了什么。

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一是经济层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富民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大家说很多。二是社会层面，各个阶层应该是大体公平的，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三是政治层面，大家谈政治改革提的是宪政主义，我想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前加“宪政”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它包含这样五个方面：

第一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一个国家只要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就可以保障平衡、和谐。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的权威应该是必要的。那么，宪法权威来自哪里？来自人民的认可。在许多国家宪法都要公决的，宪法修改都要人民来投票的，宪法应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比而言，我们的宪法权威还不够，我们的各级官员没有把宪法看得很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宪法通过和修改程序还不够完善，还需要改善。

第二是确立一个政治秩序。这些政治秩序所靠的就是一个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才能解决滥权。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对权力加以制约，如果宪法不制约政府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就走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们现在政治体系中的政府权力很多不是真正的权力，而是官员的权力，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权力，所以我们才要进行权力改革。

第三是政治民主。最根本是要解决老百姓行使管理权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不论什么制度都要保障老百姓有一个选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这是民主制度最根本的问题。而这选举不仅仅是基层的选举，更重要是国家最高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从间接选举走向直接选举。现在的人大代表有些也不能代表人民也无需向他的“选民”负责。当然，考虑到我国情况特殊，落实人民的选举权可以分步走。可以不必太急，但是必须前进。

第四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如何落实，如何规定。人权也好，民权也好，终究是人民的权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权利终要不断扩大。现在我们国民的权利确实比过去扩大了，比如在过去我们连到国外旅游的自由都没有。今天也实现了。但是，是不是还有待于更多的扩大呢？我想老百姓无非是饭吃的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这些需求——各种方面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其它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我想这种制度人民肯定会拥护。

第五是我们还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不是摆在那里给人看的，宪法的权利受到违反，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要有违宪的审查，或者说宪法意义上权利的保障。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诉讼的保障，权利是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权利如何落实是重中之重。我们这次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法，虽然比起原来全国人大的监督法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仍然要有一个希望，要不断地在往前走。有了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治，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法律，但是我们仍然没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有了宪法，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宪政的社会，我想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宪政主义。

(转载自《改革内参》2006年第29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 100045 电话 010-68532048

劝君少颂秦始皇

• 王也扬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史家早有定论。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颂扬却常常甚嚣尘上,他的反人类的残暴行为也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近年一些当红文艺家更是把他的形象搬上舞台,国内外大演特演,还有人说这是在宣传和平,真是极大的讽刺!笔者不能不指出,这样的思想文化现象很不正常。

秦始皇被颂扬的理由,是他统一了中国。这值得谈谈。我们纵观古今,人类社会从早期的部落,到小国林立,到大国崛起,再到国家共同体的出现……可以说,走向统一,走向世界大同,的确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过去时代,统一之路有两条线索,一是社会经济的进步,生产力这只看不见的手造成思想、文化的融合,要求地域、政治的统一;一是部落、民族、国家间的征服。前者是和平的、永恒的,后者则是暴力的,是人类社会野蛮时代的产物。虽然征服曾经有过推动历史的作用,但滥用暴力无论何时都是受谴责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兴仁义之师”、“伐无道”,也强调暴力有其道德底线。那种视人民生命如草芥,行“无道”的残暴政权,即使它统一的国土再辽阔,也会是短命的。如何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呢?首先须说明,就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而言,秦始皇不是第一人,他之前夏、商、周三代都曾建立过统一的中央王朝,因此说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为:秦始皇是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一人。所以评价秦始皇的统一,最主要的是看他开创的这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究竟积极的意义大,还是消极的意义大。戊戌维新以来,我国思想界不断批判秦政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窒碍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制度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自由和创新活力,正是这种制度使得很早

就在我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反复摧残,终不能成长壮大。我完全同意批判者的意见。秦朝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当然应该肯定。但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指出的:“这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郭氏以自己对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的研究,认为经过两周七八百年的自然进化,当时列国文字的趋同已很明显,秦统一是水到渠成的事,秦朝的度量衡则沿用当年商鞅变法时的标准,亦非嬴政主持制定。

评价秦始皇的统一,还要看它给人民到底带来了什么。是和平吗?否,是死亡。是幸福吗?否,是灾难。秦对列国发动的战争,死人无数。那时还发明了以斩敌首级计战功的办法,造成将士滥杀成风,大军所过,妇孺百姓的头颅也被一齐割下凑数。据正史记载,至秦襄公五十一年,秦杀敌人数就达130余万,其中长平战役一次便活埋赵国降卒45万,这在当年也属骇人听闻。秦统一后,人民并没有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嬴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他为自己营建连绵百里的豪华宫苑——阿房宫,又历时数十年修筑工程浩大的骊山墓,仅后者就征用工匠70余万。此外,“北筑长城”用40余万人;“南戍五岭”用50余万人,还有其他数不尽的徭役,每年无偿强征不下300万人,相当于全国约两千万总人口的15%以上!如果除去老幼,则占了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许多地方男子不足就征女性顶替。这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嬴政蔑视儒家的王道,崇尚法家的霸道,把韩非“法、术、势”一套付诸实施,用动辄杀人的严刑峻法威慑臣民。秦律的特点是繁酷和轻罪重罚,仅死刑就有斩(如戍边失期者“法皆斩”)、戮(先施刑受辱后斩首)、车裂(俗称“五马分尸”)、枭首(悬首级示众)、弃市(在市井当众处死)、腰斩、釜烹、坑杀(活埋)、夷族(不仅夷三族,还夷九族)等十余种,肉刑(刺

面、割鼻、断足、去势等)更为普遍,受刑者“不可胜数”,以致“剺鼻盈筐(筐),断足盈车”。还有大量的劳役刑。在筑阿房宫、骊山墓乃至长城的工地上,就役使近百万刑徒,这些人大多有去无回,死在他乡。清代《房县志》记载,北方丛林里曾生活着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其祖辈是逃避筑长城的劳役犯,他们见人会问: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乎?只要回答秦皇还在,“毛人”就吓得逃入丛林。这种可怕的传说被人们世代相传,印证当年嬴政确把全国变成了“赫衣塞路、圉圉成市”的恐怖的大监狱。

禁锢思想,文化专制,是秦政在中国历史上开启的最恶劣的先河。秦始皇把“五德始终说”尊为全国唯一信奉的学说,有碍于“定一尊”的其他思想则被视为异端,一律封杀。“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公元前213年,秦王朝下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即刺面后服筑城劳役);此后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即夷族)。如此严酷的法令,顿使全国鸦雀无声,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遗产化为灰烬。郭沫若评论道:“书籍被焚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见《十批判书》)就在焚书的第二年,发生了秦始皇坑埋四百六十余儒生的事件,有种说法将那些被坑者指为因炼长生不老药“终不得”而骗了嬴政的方士,但《史记》引皇长子扶苏进谏的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说明秦始皇坑的主要还是“诵法孔子”的儒生。从嬴政公布这些人的罪状“为妖言以乱黔首”来看,也可证明“坑儒”事件是与“焚书”相呼应,以暴力手段对付非暴力的思想言论,实行



秦始皇

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行为。

已故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指出,秦始皇的残暴不是一般的用“统治阶级本性”可以解释的,他要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这就关涉嬴政其人的个性品格问题。与嬴政有过接触的尉繚留下了这样的话: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史书记载,生性多疑的嬴政除身边少数宠幸之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止,为此他居无定所,宫殿之间以暗道相连。一天他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骑仪仗甚为隆重,面露不悦之色。此事被李斯得知,立即减少了自己的车骑。当嬴政再次看到李斯的

车骑时,意识到身边有人通风报信,竟下令将那天在场的人全部处死。公元前211年,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发泄仇恨,嬴政闻之大怒,因捉不到作案者,遂把陨石落地周围村庄的居民统统杀死。这些事例,活脱脱显现一个独夫民贼彻底泯灭人性的“虎狼”面目。大独裁者总是孤家寡人,其亲信也多为卑劣之徒。秦始皇最后死在巡游途中的一场政变阴谋之中,政变的主谋是他身边唯一信任的侍卫长、太监赵高。史家怀疑嬴政死于被赵高等人谋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政变上台的秦二世胡亥继续行暴政,人民起义的怒涛已不可遏制。于是,赵高再搞政变杀了秦二世,让胡亥兄弟的儿子公子婴即位。公子婴上台后又杀了赵高,并夷其三族,自己最后不得不向起义军投降,秦朝灭亡。时距秦统一才过了短短的15年。

秦统一的历史意义,史家可以讨论。但秦始皇作为千古暴君,被永远钉在罪恶之柱上则是铁的事实。颂扬暴君是不道德也不光彩的,应该休矣。

(责任编辑 吴 思)

陈独秀晚年重新认识民主主义

• 尹振环

陈独秀晚年虽然不隶属于中共、托派,但他还是承认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之信徒的,这一点很重要。虽然陈还没有明确提出“暴力社会主义”,但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陈独秀早在1936年就已经郑重提出这个问题,他用“孔甲”的笔名,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指出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误解,他说:第一,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乃是人类社会化进步的一种动力,它不断推进社会向善、向前。无产阶级理应把完成民主的任务放在肩上,不可在夺取政权后摒弃民主。第二,我们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纲和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能把民主主义当作是与社会主义不能共存的东西。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就摒弃了民主主义,文章抨击斯大林根本不懂这一点(《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69页,下只注页数)。陈独秀在1936年曾“应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之邀,推荐生活潦倒不堪的王文元到东亚”,王译编了两本书:《莫斯科审判的国际舆论》、《莫斯科审判的真相》。这就是陈独秀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年谱》,第472页)。另外据濮清泉回忆当时陈在狱中与濮等人议论莫斯科审判“布托联盟”案件,认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贱视民主”;“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是违背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变成了“官僚国家”,不应再称为“工人国家”(《年谱》,第469页)。这表示陈独秀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理性思考后的巨大转变!即抛弃暴力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

全面发挥上述思想的是陈独秀以下的两篇文章:(一)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二)1940年(年谱为1941年,似不确)11月28日《我的根本意见》。前封信是“在病中花了二十余日”写的。当时“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胀痛,耳鸣亦加剧了。”(《年谱》,第524页)后封信看来也是高血压病中写的,这可谓陈生前的重要遗言。由于它是病中所写,所以写得不长,不可能详加论述,但它又触及产生斯大林“制度”的主要方面,而且追及它的根源。所以这两篇文献的价值非同一般,所以需要详加引用。

在第一封信中,陈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的意见。”既反思苏俄二十年的历史,又反思自身与中共历史的亲身感受,可谓百感交集。

第一,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陈说:“我认为没有人民的政权固然不能实现人民民主,如果不实现人民民主,则所谓人民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势所必然的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治警察)政制。”这可以说是陈氏之总论。

第二,较之英、法、美的民主,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我认为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希特勒)、俄(苏联)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反动的,不管它口头说得如何‘左’”。从来都认为比资产阶级民主千百倍的苏联,陈独秀个人那时就竟然视之为退步和反动的。

第三,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民主,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只有实施范围和方法的不同。陈说“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过去认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者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民主。而陈独秀说:“民主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从下文可知,他说的“基本内容”就是指思想、出版、言论、选举、罢免自由等这些民主内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相同的,如果不同,那就是无产阶级实施民主的范围更广泛,更真实,程度较之资产阶级有更大的进步。

第四,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排斥议会制度的同时排斥民主。“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斯大林独揽党政军三大权,不要说普通的工人、农民,就是政治局、中央委员等高层领导,如果你要批评斯大林,那么无异于活腻了,要自杀。苏维埃早已成为领导人手中的玩物、装饰,无异于十分听话的表决机。这样的制度还能不堕落?

第五,民主是世界从古至今以至永久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的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陈独秀

基本内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样的。”“民主”与“科学”一样,绝不仅仅是手段,革命要求达到科学与民主的目的。“民主”乃是古今中外永久反特权的旗帜。

第六,至为宝贵的三大天才发明:科学、民主、社会主义。陈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前面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

产阶级民主’;大众(人民)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和门面语。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更加把独裁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的本土苏俄,更是变本加厉。”陈独秀已经看到斯大林这种体制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陈独秀视“社会主义”为“三大发明”之一,也就是说它必须与科学、民主配套并行,离了科学与民主,社会主义必将变质。

第七,不从制度上汲取教训,还会有若干个斯大林冒出来。陈说:“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痛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耗尽之时,不

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我理解,所谓“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是指什么呢?一是“一党专政”,二是“集权于一身”。现代政党政治的特征是竞争性,公开性,群众性,选择性,

轮替性,党内外都不搞终身制、垄断制,定时轮换更新,调整政策,监督性。对上至领袖、下至官员、他们的军国大事、家庭、男女私情皆置于媒体、公众的评头品足中。在斯大林体制下这一切都没有了,而是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语),终身在职,不能批评,不受任何监督,对

严重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第八,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免不了产生专制。“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着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是怎样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免不了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402页)。

第九,一张让“大家醒醒吧”的对照表,陈独秀专门划了一张对比两种制度的表:

(甲) 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乙) 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 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一) 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 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二) 秘密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 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三) 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 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四) 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 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五) 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犯罪。

在这张表后,陈独秀说:“每个康米尼斯特(即共产党员——编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吧!”

过了不久,即1940年11月28日(恐怕不是《年谱》所说的1941年),陈独秀又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十五条意见,其中有三条关于斯大林主义及民主方面的意见:

……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

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这三条意见中,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这仅从上述引文中就已是第四次提到了。为什么陈氏这样重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因为它们无不是官僚、专制、独裁的强烈消毒毒素。同时自然这也是有鉴于苏俄“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提出的。(下转58页)



● 夏永安

2006年10月,三峡工程实现三期156米蓄水目标。到2008年将比计划早一年全部竣工。但是,三峡工程从1919年提出到1994年正式动工,历时长达75年。期间,对这一特大型水利工程主张“早上”、“快上”、“缓上”、“根本不应该上”……等各种呼声和议论不断。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不少想法和议论。我看,这是一件好事。事关千秋功业,有议论总比鸦雀无声好。

现在,我们仅回忆一下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一段时间内,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插曲”。虽然已事过境迁,但我认为这并非是一件无意义的事,而是颇值得仔细回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和吸取。

—

1984年初,原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曾经就《组建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批示给有关同志研究后提出意见。

此后,有关同志在省和国家领导多次强调要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精神的指导下,他们请了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指导,并支持他们编辑相关调研著述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论文,这位科学家就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周培源。周老一

直十分关心三峡工程,他很快就表示赞成以上有关同志编写的书,并建议将书名改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并向有关同志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三峡工程的一系列具体想法和建议。后来,有关同志本着周老的这一指导思想,相继编辑并出版了《论》、《再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共四本论著。

“插曲”之一:当上述有关同志编辑的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行将问世之时,作为该书的编者,尚未见到样书,我国有关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而且有消息传出,该领导不满意他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此书,还说主管部门宁愿出资收买全部新书(3100册),也不准拿到新华书店公开出售。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想用控制舆论以实现其“一言堂”的目的。后来,经过该书的编者一番理直气壮的申辩,第一本书总算在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插曲”之二:1989年4月初,姚依林副总理在七届二次人大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主持招待会的某中央领导人委托,说兴建三峡工程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姚认为该项工程今后五年之内,即到1994年不会上马。但不久后有消息说,有些身居高位的人在不同场合说三道四,责怪姚副总理上述讲话不当,还称三峡工程还应早

上快上。1989年8月间,周培源同志从一份内部文件中获悉,一些同志在广州集会宣传“八五”期间乃是三峡工程的最佳时机,从而推翻了姚副总理上述讲话的精神。

“插曲”之三:《长江长江》是一本论据充分,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书。1989年初,首都新闻界的一些知名记者,他们分别来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他们访问了周培源、林华、孙越崎、田方等人,撰写了此书并出版了。因为当时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经确定了早建方案,要求此工程在1989年即动工兴建。所以记者们和被访问的专家学者都希望尽速反映不同意见,对延缓该工程上马时机起点作用。

1989年9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写信给被访问学者之一田方同志所在单位党委,居然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并诬称这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并说你单位××、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的参考……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呀!由周老等多位著名科学家和专家对记者公开发表的谈话,竟被人随便定罪,这是典型的“文革”遗风!好在,上述涉及单位的领导客观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认为学术上的争论,工程上与不上意见对立,不能因为某本书的主编“出了问题”便牵涉到被访问者。



全国人大以绝对多数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

“插曲”之四:1992年春,水利部、能源部和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等11个部门在军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长江三峡工程展览》,由水利水电等出版社编印了有关三峡工程的丛书,更准备好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的说明》和长篇附件,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

鉴于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事关全局,兴建此项工程是造福后代,还是贻患子孙,此时还存在很大的歧见。所以四川省、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带来了有关知名人士撰写的《详陈兴筑三峡工程危害请考虑放弃方案书》等文稿,到了北京,代表们又读到周培源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赴鄂川视察团团团长所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设》。

但是令代表们不解的是,同样是全国政协某副主席和全国人大某副委员长率团(20多人)考察三峡的报告,新闻媒体作了大量的突出报道,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率团(182位政协委员)的考察报告,新闻媒体却从未作过公开报道。原来主要的区别在于周老报告的结论是“快上不如缓上”。真金不怕火烧,为什么在三峡工程决议案尚未表决前,和主管部门意见相左的考察报告就不能公开报道呢!?

“插曲”之五:1992年初,全国人大通过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弃权票加上反对票占投票总数近三分之二)后,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关于三

峡工程存在不同的意见,并防止决策中产生进一步的失误,有关人士商请周老以他在1991年7月所写的《关于开发大西南,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作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的代序,并重新发表了周老上述那篇文章《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设》。

本来有关出版社的领导积极支持出版

《三论》,并要求在扉页上和出版社共同署名“献给党的十四大代表”。不久,该书的清样已排出。不料,此书却被有关部门视为“不利于十四大的安全”,并勒令不准作为正式出版物公开出版发行,不给书号,不准送进十四大会场。十四大闭幕前,只准作为“征求意见稿”,当作“内部资料”,限量自费印刷。

在某领导人的心目中,似乎一有不同的意见公开表达,就会妨碍国家和党的安全!上述措施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插曲”之六:黄万里先生是我国著名水利、水文学专家。他因正确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长期备受歧视,遭遇坎坷。黄老从1985年起,一直坚持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并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我认为且不论黄老的“根本不主张上”的主张与论据是否全面和正确,但纵观他一生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他在专业学识上深厚的素养和独特的见解,我国相关领导部门的负责人总是应该对他的主张与建议给予应有的关心和重视。但实际上:黄未能受邀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他反对三峡工程的陈述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我还要提到另一个细节:2001年9月4日,在向黄万里遗体告别仪式上,李锐同志去了。他那天也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召开的一个会议。他旁边坐的都是水利界的名人,而这些名人根本不知道此事: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二

上述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插曲”的叙述已很能说明为什么值得回味了。一言以蔽之,我国有关部门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



百万移民中的第一户谭德训一家

小组中有些人对与其意见相左者常常采取不予置理,控制舆论,防止“扩散”,直接以行政命令封杀对方出版物,有时甚至不惜扣上政治性大帽子等恶劣手法。这些做法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了十多年之后,更加发人深省!这说明以往用政治权势压制与己不同见解者的不良倾向依然存在。

三峡工程的兴建再过一年即将全部竣工。像这样一项超大型工程的质量和它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我认为在全部完工后,可能至少要看上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才能有比较客观的正确判断和评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那时,我们再说三峡工程的兴建“不存在不可解决的技术、生态和投资上的问题”,说“三峡工程的质量非常非常地好”也不迟。

科学的真理从来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和利益之外。只有实行广泛的民主,才可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

1958年,在清华大学校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黄冷静而又掷地有声地回答:“伽里略虽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我谨借此名言结束本文。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为争取读书机会引出的离奇经历

·
张玉钟

为求学假“烈士遗孤”，爱读书成“政治骗子”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历经两千多年，到了蔡忠平身上却成了“唯成分论”，使他处处求学碰壁，一生21年的劳改厄运便由此而起。

蔡家住在莆田仙游交界处“东沙朱寨”村，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加上是有钱人家，1949年以后，大伯被镇压了，父亲母亲都成了“四类管教分子”，还有堂叔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中。

人生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罪恶的烙印从小就打在蔡忠平的脸上。上小学一二年级就被同学们奚落为“地主仔”，放学路上常被他们用沙子、石子追打着，吓得他不敢上学，哭着闹着要到外地亲戚家里去念书。上初中他到了上海二伯家，考取上海培光中学。但那正是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谁家多了外来的一双筷子都难以承受，无奈他只好恋恋不舍离开上海回到莆田，转学到笏石的莆田第十中学，校方因他成绩好而忽视了他的家庭出身，竟准予他插班入学，还当上校学生会学习委员。但那时“阶级斗争”口号越唱越响，学校发现他原来是剥削阶级子女，便劝他退学。他又转到了灵川何寨的第十八中，这里离他家更近，只念两个月书，他家“老底”便暴露无遗，他家的发迹史还成了学校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他又一次被退学回家。

在莆田再也无处念书了，他想起惠安南埔大前村有个“贫农”成分的亲戚，便瞒着家人，拿着上海培光中学的成绩单，假冒是“贫农”亲戚的子弟，找到惠安第二中学，学校看他成绩好就让他插班学习。好不容易等到中考（初中考高中）的前一天，他假冒“贫农”成分却被政审发现，被取消了他考试资格。

念高中的路断了。可怜的蔡忠平，当时才16岁，年幼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怎么办？小小年纪选择了抗争之路，他决定给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写申诉信，而且从此走上了抗争的不归路，一次又一次申诉，一次又一次遭难，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但他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倔强。

他向国家教育部长述说自己因成分不好而屡遭退学厄运，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愿望，要求让他重新迈进学校大门。教育部给他回信，说转福建省教育厅处理，却杳无音信。他决定赴京申诉。他不敢把决定告诉父母，哪来的盘缠？只好开动脑筋，花小钱买了从福州到莪洋的火车票，而后为了躲避查票，偷偷躲在厕所，一直到了上海终于被发现，但一个小孩子，又撒了些可笑的谎言，查票的为他稚气所感动，终未深究而放他出站。他找到在上海师大念书的堂兄，讨了钱买了火车票到了京城，找到教育部。他送给接访的人一份长达10页的申诉信，还给他看了自己的成绩单和一本中学生作文选，其中有他的作文。接访的人看了他的申诉信，深为这个小孩子只身赴京的勇气和那流利的文字、工整的笔迹所打动，问信是不是他自己所写？得

到他肯定答复后,随即给福建省教育厅写信,还为他买了一张回福州的火车票。但他回到福州在省教育厅门口踟躅良久,想起上次石沉大海,心冷了半截,终鼓不起勇气进去,转念决定到南平,找到在水泥厂工作的姐姐,先混个临时工糊口。那时还有市长接待日,他壮着胆,拿着上海的户口迁移证上访市长,一位姓黄的副市长听了他的经历颇为同情,通过有关部门把他安排到峡阳林场当职工,他人生第一次有了个落脚点,这在当年也算是件很好的事,如果蔡忠平从此“安分守己”,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大灾大难,但偏偏他求学欲望越来越旺,他总想自己才16岁,正是读书的大好年华,怎能白白流失?况且他选择到南平的初衷之一,是想南平离莆田有500里远,人生地不熟,总该可以摆脱家庭成分的紧箍咒。

他在峡阳林场一边做工,一边到处找书看,还自学数理化课程。恰好他看到黄国璋写的一本回忆录,黄是莆田籍的一个老革命,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读着这位老乡前辈的书特别亲切。读着读着,他被书中写的一位与他同姓同庚的烈士遗孤所吸引,在强烈的求学欲望驱使下,他萌生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假冒烈士遗孤,报名参加南平地区中考。这一考,考出个“状元”,南平地区成绩最高分,南平一中看中了他,可他并没填这个志愿,不是他不想,而是小小年纪在政治环境的重压下,不得不比同龄人更多长心眼,他知道南平一中有个管档案的偏偏是他老家人,小时候这个人还抱过他,万一被揭发了那还得了,所以他只敢报中专,福建水电学校、福建轻工学校同时录取他,但南平一中张子谦书记非常爱才,这样一个“状元”不录取岂不可惜?他电话直接打到林场,告诉他一中录取了他。这一喜讯传来,他既欣喜若狂又忐忑不安,但受读书兴趣的鼓舞,他顾不了那么多,冒再大的风险也甘愿,义无反顾地到南平一中报到。他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整天如饥似渴泡在书堆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5年底,高中还未毕业,就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中。这是个平常学生望尘莫及的学院,很多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后代都在这所学院就读。蔡忠平成绩好又是“烈士遗

孤”,学校就把他保送到这所学院。

1966年2月,蔡忠平从南方到了遥远的北方,跨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那年他18岁,整个脑子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他也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假冒对吗?他心头也难免掠过一丝丝不安,但他总是自我安慰,是社会不给我读书机会,我才想出这种点子,我不就是为了读书吗?他觉得问心无愧。当他第一天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仰望着宏伟的校门,心中默默立下宏愿,我一定要争一口气,把书本当馒头啃,拿到最优异的成绩,将来当个优秀的军事科技人员,以此回报社会、回报父母。

然而,他好梦不长,刚在大学校园度过最平静的学习生活几个月,1966年9月的一天,学院教务处领导找他谈话,严肃指出他假冒烈士遗孤问题,并通知他被取消入学资格。他也只能乖乖卷起铺盖回莆田老家,而他这时还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很快将接踵而至。

对此,蔡忠平一直不服气。纵然假冒成分千错万错,但他只是为了争取读书权利,万般无奈之下才走这条路,而且也是靠真才实学保送的。他说什么也要据理力争,他提笔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工委写信申诉,要求给他继续读书或安排工作的机会。他们把信转给国务院安置办,国务院安置办回信告知他找晋江专署(当时莆田县隶属晋江专署)办理。他拿着国务院安置办的信,到泉州找到专署,公安处一部车把他直送到莆田县公安局,一到就被县公安局戴上手铐,送到雷山看守所。没过几天,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就宣布法院判决:蔡忠平“出身反动剥削家庭,妄图钻进国家科学尖端部门”,是个“政治骗子”,判处5年有期徒刑。

五年刑满仍关押不放,越狱逃亡成“台湾特务”

1970年2月,他们整体被转移到浦城永平劳改场。劳改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饥饿的压迫有时会派生出难以想象的智慧。1970年12月26日那一天,因这时他离刑满只有一年,已属于“轻犯”,监管干部就叫他当组长,带15个犯人上山砍杉木。这是重体力活,一个个饿得眼冒

金星。炊事员“请示”组长“晚饭如何煮？按定量，一人一顿只有三两米。蔡忠平难得行使一次“权力”，眼睛转了转“命令”道：每人煮一斤。炊事员惊奇地睁大双眼：一顿吃掉一天，干部追问起来，怎么办？蔡忠平说：你就说是我定的，责任我负！果然，管教干部知道后火冒三丈，把蔡忠平叫来厉声训斥“你又犯罪”，问他为什么饭煮这么多？蔡忠平镇静地大声回答：“报告干部，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日，大家提议庆祝。”“什么……”管教干部气得发抖，却说不出话来。事情得以暂时平息，这一餐吃得底朝天，每个人都从心里暗暗感激这个蔡“小弟”。五年刑满，蔡忠平心想可以重见天日了，他天天盼望通知，可是一天又一天，越盼消息越渺茫。后来他知道，自己“表现不好，滞留监管”。他想，这是什么“王法”？照此要熬到何年何月？心里越想越不服，终于作出了一个令他自己也吃惊的决定：越狱偷跑。

1972年8月4日，他在外出劳动中寻到一个机会，脱队跑到山上树林里躲藏，晚上10时他悄悄摸到平时有交往的一户山民家中，他知道他心地善良，也知道他同情他的遭遇，他是不会告发的，在他家住了两天，弄到一张地图，作了逃亡路上一些准备，还选定一条路线，从浦城穿越一片原始森林，到武夷山，再到建阳，再想办法逃回莆田老家，他太想念家中老父老母，他幸运地回到莆田，偷偷摸摸潜回老家，父母亲分别几年，自然是一场啼哭，但他在家中不敢久留。他化了名，靠着朋友帮助，先后到沙县青州造纸厂、华安金山林场做工，甚至还在漳州机场当上油库工程的小包工头。但这隐姓埋名的日子也不是个头，他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出国。他想到非法越境，不行！和他一起关押的就有越境的犯人，到时本来自己无罪反而真成了罪犯。这时，朋友给他介绍一桩招亲婚姻，是晋江金井的一个菲律宾侨属，他想这样一举两得，自己二十五六岁也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而且还有可能出国，彻底摆脱自己“魔鬼”身份，实现求学愿望，再图事业发展。

他在朋友的引领下，到了那位菲律宾侨属家，与女方见面，双方颇感满意。这一天晚上他住在金井华侨宾馆，但世上的事真是太巧了，第

二天早饭时他遇上一个仿佛面熟的人，住在他斜对面房间，他觉得可能是老家姓蔡的同宗，还是同学加上一点小亲戚，他是晋江公安处侦察员，如他认出自己，那还了得。对方不愧是个公安侦察员，他已经牢牢地盯住了蔡忠平，见到蔡忠平急匆匆走出宾馆，他随即拔出手枪向天射击，“乒、乒”两声枪响，并随着“抓特务、抓特务”的高喊声，这个寂静的小镇顿时乱成一团。蔡忠平却机灵地闪到金井中学的厕所里，躲了许久见没动静，就找到中山街一个劳改同伴家中，同伴的妈妈告诉他，刚才政府已来人通知，有一个莆田人特务，如看到要马上汇报。老妈妈拿了50元钱给他（当年住金井宾馆一夜才八角钱），叫他赶快离开。他知道，整个“抓特务”的国家机器已经开动，他已成瓮中之鳖，很难脱身，但他还想“挣扎”。

他想汽车站肯定被控制了，他在偏僻处雇辆自行车，特意绕小路坐到安海、过五里桥到了南安水头，在一个劳改同伴的亲戚家住了一夜。他庆幸自己来时，在晋江交际处（即现在的宾馆）巧妙地偷了一张晋江专区地图。他选定了一条往北逃到仙游山区的路线，从水头到南安县城，再经梅山、洪濑，从山路翻到仙游，兴许还可脱身。可是这个时候，全晋江都已撒下天罗地网，公安部门已经认定他是经台湾训练过两年的特务（刑满后多关押一年被算在内），正在到处追捕。

这一天，是1973年7月13日，一辆吉普车终于堵住了他的去路，吉普车上的人大叫：“蔡忠平，你跑不掉了！”他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蔡忠平，你逃到台湾两年了，把你当特务的事实如实交待。”提审人员一开口就这样发问。

蔡忠平惊出一身冷汗，真把他当“台湾特务”，就可能不加审判把他枪毙，那真会冤透了。他赶快毫不含糊地申辩：“我承认我是逃跑的劳改犯，但确实不是台湾特务，也没有去过台湾。”

于是他把五年刑满仍被关押，而后决定越狱偷跑的经过如实交待。提审的人员开始根本不相信，说他在编造故事，要他把偷跑以来的一天一天都交待清楚。蔡忠平就把如何隐姓埋名，在几个地方打工一一叙说，有提审人员进进出

出,这是打电话核对他交待的情况。审到半夜,提审人员终于相信蔡忠平交待的真实性,弄得啼笑皆非,站起来打了个呵欠,大骂道:“原来只是个劳改逃跑犯,还以为抓了个台湾特务,弄得全中国都动起来。”

判无期徒刑遣送新疆,申诉加读书坚持不懈

只过两天,蔡忠平就从晋江公安处看守所押送到龙岩青草垄劳改场,原来关押他的浦城永兴劳改场已撤消并入这里。

世事真是无奇不有,奇就奇在真假也会转变。蔡忠平在晋江被当成“台湾特务”追捕,但那是假的,他不是特务,更没去过台湾。后来的演变却有点戏剧性。他被关押这里,谁也没判他加刑,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却刑满不放,到了1975年6月,宣布他留队就业,但那时留队就业与劳改犯人待遇几乎无别。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蔡忠平内心本能地更加痛苦不堪。尽管他自“文革”开始就成“政治犯”,一天到晚关押高墙之内,而他却也名副其实关心政治;“文革”中的监狱书报奇缺,他对垃圾堆里的片纸只字、烂鱼臭虾的包装纸也不放过。早在年初邓小平受到诬陷时,他就到场里说:“只有邓小平中国才有希望”;“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刚发生,他就说“悼念周总理好得很”。监狱里马上召开全监大会批斗他,说是“邓小平在台上叫,蔡忠平在台下跳”,给他戴上“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帽子而再次蒙受打击。这时,他确实萌生了想办法去台湾的念头。他想第一步到台湾寻找堂叔蔡荣郊,取得栖身的条件,第二步寻求继续求学的机会,他实在太想读书了,一生的罪名皆由此而起,如一辈子上不了学,那真会死不瞑目。

劳改同伴中几个人一起议论如何逃离大陆,去台湾投亲、求学、谋生。他们商议去台的蛛丝马迹很快被狱方发现,公安部门就指派一个也受过刑事处分而想立功表现的人作“探子”,假装要与他们共同策划去台而取得他们信任,蔡忠平把自己去台想法向他和盘托出。此人因受“组织”保护,说话毫无顾忌,一会儿怂恿他们

组织反革命暴动,一会儿又鼓励他们书写反革命纲领,均遭到蔡的痛斥,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并表示自己目的只是想去台投亲求学,绝不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此人却已把蔡的想法添油加醋密报上去。1976年4月22日,蔡忠平在劳动时被龙岩县公安局拘留。1976年9月15日,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为了稳定治安,当地召开声势浩大的镇压大会,枪毙一批罪犯,蔡忠平被拉去“陪斩”,去之前他把身上没用完的饭票都分给同伴,心想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大会上只是宣布逮捕他。而后再久押不决三年,直到1979年4月24日,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出示证据、没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永春县人民法院宣布他是“反革命投敌集团主犯”,判决他无期徒刑。而判决书上的日期却是1977年的。到了1983年11月,他因不服而屡屡抗争,被当成从重从严打击对象,遣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2团劳改。

就在蔡忠平被宣布判无期徒刑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上诉状,而后再提出6份补充上诉材料。他绝不服判决,他用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构不成“反革命投敌”罪。但是9个月过去仍杳无音讯,既无驳回也不答复。他提笔给邓小平写信,反映自己蒙受冤屈,他把信给监管人员看,龙岩地区公安处动员他信不要寄出去,并马上派人到晋江地区中级法院催办,这一天是1980年2月5日,只隔4天,晋江中院根本没有认真审核材料,就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结论。此后一个多月即3月14日,他被转押到福建省第二监狱服刑。

从此,他开始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不断地写、不断地寄,他先后寄出去的申诉信近1000封,他几乎把监狱里的每月补贴费全用于买邮票,尽管十有八九石沉大海,但他百折不挠、从不灰心。

除了坚持不懈申诉自己无罪外,蔡中平还对求学一直念念不忘。他这一生苦难皆由求学而惹祸,但他从不后悔,漫长而苦难的劳改生活一点也没泯灭他心头求知的欲望。他利用一切途径,在监狱里自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各种课程只要能找到书本的他都学。他还报名参加人民日报社新闻函授(下转34页)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

• 王 龙

1931年初夏,刚刚30岁的贺诚只带着一名文书就走马上任,担任了红军总军医处长。

他就是我军首任卫生部长、党和军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当过“五十年代的头号右派老爷、六十年代的走资派、七十年代的复辟派……”

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秘密工作、万里长征……一手握针筒,一手拿枪杆;半辈子枪林弹雨,二十年毁誉相随——翻开贺诚将军的历史,千秋功业,一生坎坷,令人感慨不已!

一封慷慨悲哀的“陈情表”遥寄中南海,毛泽东以一个诗人的感叹为贺诚挥笔平反

1972年6月28日,一封来自山西太原北郊总后干休所的信被呈上了毛主席案头:
主席: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

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央派我去您领导下的红军工作的任务。您曾指示我,大量培养红色医生,要争取俘虏医生留红军工作。我都做了。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极端缺乏医生的局面。您的指示,成为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良好卫生传统之一。这是我的过去。

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作的情况下过生活。这使我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接下来,这封署名贺诚的信对1955年中央

关于他的错误决定,及长期以来因这一案子扣在他头上的“反党翻案”罪名坦陈了自己的看法:当年对他的批判和处分是不公正的,这已被十多年来党的卫生工作实践所证明。十多年来,他对中央关于他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始终抱着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的态度。经过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事实已替他翻了案。无论中央是否明文为他平反,他已无案可翻了;“反党翻案”的大帽子是加不到他的头上的。

信的最后这样写道: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毛主席伏案逐字逐句读完了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还提笔认真补齐了个别遗漏的字句,当天即在信的首页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

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

一线曙色,似乎就要破云而出。

然而由于“四人帮”烈焰未息,政治环境依然十分复杂,不少干部要求落实政策,但得到的答复往往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凡是不按要求作出检讨的,都不能得到解放。1974年底,中央考虑国务院组成人选时,周恩来总理确定贺诚担任卫生部长,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也未实现。

时间一晃到了1975年5月。这一天闲居北京复兴门外一处机关大院的贺诚,突然接到总后通知:在家等候,一刻钟内有车来接,中央有位领导同志要见你!

一到中南海,接见贺诚的竟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两位相识多年的老战

友,邓小平笑着对贺诚说:“你有个在成都的女儿叫贺礼荣吧,她给我写信替你这个做爸爸的要求工作呢!”

邓小平接着告诉贺诚:“接到你女儿的信,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贺诚同志的问题我在1972年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立即又找来当时的批件,将你以前写给他那封信又仔细看了一遍,心情非常激动,当即写下了这件批示: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作为标志性的精神迅速传遍了国内上层,错误不在挨整的人,而在于整人的政策错了,平反昭雪成为堂堂正正的要求。不久,毛主席批准了总后勤部党委关于给贺诚彻底平反的报告,任命贺诚为总后第一副部长。挨整的老干部们纷纷来到贺诚家中,热烈道贺,击掌称快。一个灰色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从1955年到1975年,整整20年时间,贺诚,这位功勋累累也伤痕累累的共和国将军,资格最老,挨批最多,经受了长期不公正待遇和几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考验。从建国后出任国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受人诬告被批判为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头号老爷”、“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的资产阶级奴化思想代表”,一直到文革中的“里通外国、修正主义”陈毅、刘伯承、王稼祥都先后为他作证,洗刷罪名。他的坎坷命运和独特经历实为罕见,具有整整一代人的典型性。但贺诚毕竟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活到了91岁高龄,见到了云开日出的光明时刻。“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他传奇一生坚贞品德的胜利,更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信仰的胜利!

“为父报仇”被抛诸脑后,青年贺诚跻身于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洪流

贺诚原名贺宗霖,字润之,1901年冬生于四川射洪县龙门垭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他家早年略有田产,又是中医骨科世家,在当地还算过得去。但社会动荡,家境日窘。贺诚之父贺隆旦,一生铁



贺 诚 (1901—1992)

骨铮铮,为人嫉恶如仇。其间,本乡地主贺金山霸占祠堂,横行乡里,爱打抱不平的贺隆旦一直不服,专门和他对着干。贺金山便找个时机以其服丧期间续弦,不守礼法为由,唆使族长派人将贺隆旦抓到祠堂用竹竿痛打了一顿。新仇旧恨,让血性十足的贺隆旦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聪明好学的儿子贺诚身上。他苦撑苦熬要让儿子“读翻山”,做大官,将来衣锦还乡再报一箭之仇!

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小农之家供养一位大学生的艰难可想而知。但贺隆旦砸锅卖铁,赌了这口气要让儿子走仕途经济这条路。然而受“五四”运动影响,贺诚却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违背父亲要他“做大官”的愿望,选择了医科大学,此后又参加革命,音讯全无。“血本无归”的贺隆旦失望至极,恨透贺诚太不争气。贺隆旦仍不服输,自己拉起袍哥继续和贺金山斗,但直到死也没斗倒仇人。复仇的希望落空了,临死前贺隆旦遥望南天,含泪叮嘱家人:“……把我埋在贺胜沟垭口上,我要望着宗霖娃儿回来!”

北京医大当时虽然贵为“国立九校”之一,但

教学方法极为陈腐,既无课本又不发讲义,教师满口术语学生不知所云。于是贺诚和同学王长熙发动全班同学建议校方印发讲义,废除笔记。医大首任校长汤尔和(后任日伪教育总长,当了汉奸),是个封建霸道的家伙,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

贺诚不服输,领导学生们针锋相对,展开全校罢课。全北平学生趁势响应,很快从一校的学生运动发展到同全国学生、工人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将成星火燎原之势。当局这才慌了,怕事态扩大,只好同意汤尔和引咎辞职。

反曹锟贿选运动、欢迎孙中山北上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时逢王旗变幻、群魔乱舞的北洋军阀统治,也正是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青年贺诚热血汹涌、挥斥方遒,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时代的潮流,成为校学生会得力主将之一,并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法国“闹事”的“红党分子”陈毅被押解回国,在贺诚栖身的潼川会馆,两人一见如故,操着满口川音竟夜长谈。

贺诚这样思想激进的“赤色分子”,自然被校方深恶痛绝。在校期间他几次都差点儿被清除出校,1926年夏面临毕业时,校方干脆将他列入被开除学生名单,连文凭也不发,理由仅仅是他欠了28元学费!

贺诚将自己的处境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随即给他指明了道路:现在北伐军正需要医生,带上党的介绍信去,比什么文凭都管用!

贺诚如怀揣一团青春激情的烈焰,直奔七月流火的广州。头上呼啸着隆隆不绝的枪声炮声,耳边激荡着风雷战鼓般的北伐军歌,在简陋的战地手术台上,在炮火连天的深沟战壕中,贺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特殊实习。仿佛是前生命定的天数,他手中的那把手术刀一经磨亮,就是为战争、为革命服务的。

就在贺诚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地投身革命洪流时,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来了!而此时贺诚又因南北转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变得像幽灵密布的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面临数不清的诱捕和陷阱,面对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危机四伏接踵而来的考验,最危难的时刻,贺诚以

夸父逐日般的精神,沿着自己信仰的道路暗暗追随党组织,捧出了一颗感人的赤子之心:

——“宁汉对峙”,他毅然脱离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留在武汉由吴玉章介绍当了一名普通医生;“宁汉合流”,蒋、汪臭味相投,他马上又加入了共产党力量很强的第二方面军,以伺机与党取得联系;南昌起义爆发,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气急败坏,大骂共产党“不够朋友!”,诱骗军中的共产党员自行退党,贺诚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严守身份,从未动摇。

重回党组织怀抱的机会终于来了!

1927年12月11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贺诚此时已调任驻广州的第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起义开始前他就暗中联络了一部分军官并作了宣传发动工作,起义一开始,他立即召集军医处人员,宣布参加起义,原军医处长等三名反动军官企图阻挠起义,被贺诚果断处决了。

在总指挥部,戴上起义红领带兴奋无比的贺诚见到了张太雷、聂荣臻。来不及细说详情,张、聂即命令贺诚组织起工人赤卫队,马上接管所有医院,抢救起义伤员。

枪鸣弹啸,血流成河。由于敌我悬殊,加之帝国主义炮舰狂轰,起义者渐渐不支。贺诚带着他的军医处冒着枪林弹雨,穿行于炮火中抢救冒死血战的勇士们。

13日,敌人占领了制高点观音山。晚上,敌人已侵入城区,街道断电,冷枪嗖嗖。

起义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贺诚赶到总指挥部,见到已乱成一团的人群,心如刀绞。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开来一辆大卡车,抢出一批药品器械,一路开足马力硬闯出市区,朝起义队伍撤退方向狂追而去。

历史记载下了贺诚的功勋:他领导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处虽然只有十多个人,但却是第四军参加广州起义的唯一一个单位,而领导起义的,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年多的贺诚。连很多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是共产党员!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正如

不久后红四师在海陆丰重新恢复贺诚的党籍时，党代表袁裕百感交集地握住贺诚的手所说：“在白色恐怖下一系列转折关头，你的革命坚定性和奋斗精神，师部的同志有目共睹！”

枪声在闹市响起，倒下的究竟是谁？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是个医生，自然知道神经、耳目的重要作用！”

1928年11月，上海威海卫路春萱里最后一幢楼房的门前，悄然挂出了一块“达生医院”的牌子。医院里一对年轻夫妇衣着时髦，经常出双入对潇洒地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

“达生医院”是一座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的三层小楼，每个房间相互连通，一道后门直通另一条街区。这所医院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除了例行出诊看病外，另外还专设了传染病房：门口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消毒用具，病床上挂着详细的病历治疗卡，四处窗帘紧闭，弥漫着神秘与恐怖的气氛。一些特殊的传染病人一住进这里，便要严密保护，避免与外界接触。

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一眼这些“特殊病人”，一定会大吃一惊：他们却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关向应……

“达生医院”就是当时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掩护机关，主人便是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化名柯达文的地下工作者柯麟以及随后与贺诚结婚的周越华同志。

为严密保卫中共中央安全，与敌人进行秘密斗争，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特委或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隐蔽战线，中共中央给予中央特科下列任务：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贺诚就在周恩来、陈赓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十里洋场，向来是纸醉金迷之所。巡捕特务、海盗流氓、巨子豪杰、三教九流……人间万象，尽汇于此。贺诚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周恩来此时在黄浦江边开设“松柏斋古玩号”，以伍豪、伍老板化名及身份在上海秘密主持中共在上海的地下

机关工作，成为中共南方白区党的唯一领袖。他专门来到医院找贺诚谈话，语重心长地说：

“你是个医生，自然知道耳目、神经、血脉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你们的工作关系到党中央和政治局同志的安全……一定要胜过敌人，高敌人一招、先敌人一筹，成为党的耳目、神经和血脉！”

贺诚感到自己身负重任，压力巨大。每天脱去西装，他都要躺在床上闭目深思一下，反复仔细想今天一天的工作有无什么纰漏……

周恩来的担心不无道理。一年之后，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由于前中央军委秘书、叛徒白鑫告密出卖，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四人被捕的恶性事件。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有要事未去，得以幸免。否则，恐怕历史就要改写了。

彭湃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创始人，时任中央农委书记，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意外地捕到这样一条“大鱼”，蒋介石自然是欣喜若狂。他深知上海地下党神出鬼没，怕夜长梦多，立即下令将彭湃等人就地处决。

营救彭湃，严惩叛徒！周恩来和陈赓领导下的整个党的上海保卫机关都激动沸腾了！同志们同仇敌忾，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

8月30日清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人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陈赓得知这一情报，立即命令党在上海的保卫机关一切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埋伏在刑车必经之地“劫法场”！一时山雨欲来，颇似当年梁山好汉云集法场的气势。

按周恩来的指示，贺诚夫妇提前仔细侦察好了行动路线，准备了药品和包扎用具，随时准备接应同志，转移伤员。

应该说此次行动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然而后来由于送武器的人临阵畏缩，行动迟缓（此人后来叛变），加之敌人警戒森严，未能成功。

当天，彭湃等同志不幸遇难。

消息传来，全党悲愤。周恩来随即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怒斥国民党的罪行。同时，中央决定严惩叛徒白鑫，讨还血债！

达生医院奉命严密监视侦察白鑫的行踪。陈赓直接负责指挥,派柯麟在白鑫所住弄堂租下最后一家房子,陈赓自己也在紧靠白鑫住处的二十七号三楼租房住下,以严密监视白鑫行动。

白鑫,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三年左右加入中共,曾就读黄埔军校一期。为了确保这位“大功臣”的安全,国民党使了一招障眼法,在上海《国民日报》载文谎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已于日前解往南京,带罪立功,以观后效……”

事实上白鑫未离上海,也未去南京。

做贼心虚的白鑫深知党保卫机关的厉害,从此深居简出,偷偷摸摸。但他当时身患疟疾,不得不来达生医院找与他认识多年的柯麟看病,两个虎背熊腰的保镖随时不离左右。有一次,柯麟在给他看病时伺机脱身出来,设法想告诉联络员,但却被白鑫溜掉了。

贺诚回来后,两人分析,由于白鑫从不知道达生医院的背景,对柯麟也很信任,他们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医院照常开业,并在医院附近埋伏了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准备在白鑫露面时一举将其处决!

然而,快一个月了,白鑫再也未见踪影。

贺诚和柯麟每天都在分析叛徒的心理。贺诚沉稳地说,为安全起见,他很可能要请你去出诊。这样你的危险要大一些,但正好借此机会想方设法搞清他的住址,掌握他的活动规律。

果然,不久白鑫就打来电话请柯麟到法租界白宫饭店为他看病。在看病的过程中,柯麟假意与之攀谈,获得重要情报:为保住性命,白已搬到上海市党部委员、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里居住。

尽管如此,嗅觉灵敏的白鑫还是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想逃往意大利避风。就在他出逃前夕,贺诚和柯麟及时掌握了其出国时间定于11月11日。

狐狸终于出洞了!周恩来亲自勘定了现场,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专惩叛徒威名赫赫的“红队”人员在白所住四十三号周围弄堂里悄悄埋伏下来。

晚11时许,白鑫在范家最后一次晚宴,正当白鑫由范争波兄弟5人陪同,刚跨出范公馆打开

车门,顿时枪声大作,数支枪口电闪雷鸣,街头行人惊叫奔逃,帽子鞋子满街都是……

第二天,大上海轰动了!几十家中外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发了大叛徒白鑫毙命的消息。距离彭湃同志遇害仅仅两个月,叛徒就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任务完成,大快人心。周恩来考虑到贺诚等人的安全,安排他们立即转移。临走时,小平同志幽默地开玩笑说:“庙倒龙王在,换个地方,你贺诚照样可以呼风唤雨嘛!”

金沙水拍、大渡桥横;三过草地、四渡赤水;一台X光机,凝聚着一段动人的历史

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艰难曲折。红军初期的医疗条件相当艰苦,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部队药品、器材严重匮乏,手术台就搭在深山老林的茅棚中,红军战士用枪押着刚刚俘虏过来的白军医生,以自制的手术刀、钳子甚至木匠用的锯子为伤员动手术。

看到红军战士英勇奋战无所畏惧,而却要忍受病痛无情的折磨,贺诚心如刀割。他担任军委总军医处长后,立即向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军自己的卫生材料厂、军医学校,毛泽东赞成。1932年11月20日,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任校长。毛泽东确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开学典礼上,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切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中国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伴随革命的历程开始了红色的旅程。

1932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严密封锁,苏区的药品、食盐、粮食奇缺。贺诚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大量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创造性地改良了剂型的中药,如把粉针剂改为片剂,更为部队所欢迎。我军前、后方的药品生产、购置和供应完全统一起来,使国民党实行的药品、医疗器械封锁遭到失败。长征前夕,总卫生部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尽管当时的药品

种类还不多,质量还不高,但是解决了我军创建以来严重缺药的问题,意义非凡。贺诚和红军初期的第一台X光机所留下的动人故事,最有意思。

这台德国制造的性能较好的X光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穷二白的红军来说,无异于价值连城的“国宝”。当时中央苏区很需要这样一台机器,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尽了心机才搞到手,却无法通过重重封锁运进苏区。后来同志们灵机一动,把它装进棺材,假装运送灵柩才搬到了中央苏区。这其中的惊险曲折完全可以拍摄成一部精彩的电影,而这台机器在苏区也立下了卓著功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腑,就亏了它才找到弹片。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第三天,陈毅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跛地来告别,周恩来这才知道出发前由于伤员太多,医院顾不上给他开刀,子弹还卡在腿骨上呢!周恩来沉沉说了一句:“不能让你这样留下!”马上向红军总医院联系给陈毅开刀。而总医院报告说唯一的这台X光机已经打包,不可拆箱。周恩来立即找来军委卫生部长贺诚说明了情况,贺诚马上赶到总医院去开箱取机,二话没说亲自给陈毅动了手术,取出一颗子弹头,所以后来陈毅常说“双腿是周恩来给的”。

长征一开始,贺诚就小心翼翼地呵护他这件宝贝,专门做了一个比棺材小一点的箱子把它装起来,由两个民工抬着,附件则装在两个小箱子里,由一个民工挑着。后来民工找不到了,贺诚就命令管理它的两个小年轻去抬。夜晚行军走在路上,贺诚伺候它就像皇上一样,又怕摔了,又怕碰了,前面还要人打着火把。

从江西出发以来,经过频繁的行军战斗,那些兵工厂笨重的机器,造币厂、服装厂、印刷厂的各种设备早已丢得差不多了,但作为医生的贺诚深知这台X光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遵义会议后,红军总结教训决定整编机构,进一步轻装快进。贺诚对这台屡建奇勋的机器还是感情很深放不下。毛泽东知道了,只好把贺诚亲自找来耐心谈话。一见面他就笑着说:“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舍不得丢掉呀!”

贺诚知道说的是那台X光机,很不情愿地说:“主席,我是舍不得丢掉,恐怕你也心疼吧!”

“心疼是心疼,”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嗒嗒的东西怎么行呵!连山炮我们都扔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清楚的,不好好打几仗,这个长江过得去吗?”贺诚到底还是想通了,第二天派人把这台称为“照病机”的宝贝藏到了一个贫苦农家。

长征对于贺诚而言,重重的考验史无前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军委和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代号“红星”;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瑞金”,贺诚就任“瑞金司令”。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队伍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司令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文弱医生,看看他们是如何行军的吧:队伍中有医院、卫生学校、药材厂以及中央机关的妇孺老弱。几百担架、上百匹骡马、背刀的小伙、拄棍的老人……这是红军长征初期坛坛罐罐搬家似行军的一个缩影。贺诚率领着红军总卫生部一支老弱残病三千多人的“特种部队”,步履艰难地行进在漫漫征途上。

与其说是“司令”,不如说是个“大管家”、“大保姆”。如何让这支庞杂笨重、人数众多的队伍尽量避免敌人从天空、地面发动的袭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是贺诚每天都绷紧神经考虑的问题。

最令贺诚揪心痛苦的一件事情是长征途中出生的红军后代。在苗区,贺子珍临产了。苗人风俗不准许外人在他们的部落里生孩子。贺诚找到他们的头人耐心交涉,最后不得不答应在他们的门上披红挂彩“冲晦气”。孩子出生后,留下二十块光洋交给当地群众就走了;女红军陈慧清临产时,敌人已追了上来,又遇上她难产。枪声越来越近,接生的医生满头大汗,负责中央纵队警卫的红五军团团长说:“慢慢生,我们先把敌人顶住!”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只能在襁褓里塞上几块光洋,留在原地,抬上产妇就走……

这些英雄的母亲,何曾没有一颗慈爱的心啊!然而战斗实在太紧张了,她们坐在担架上说一声“我们快走!”,便继续行军。每当这个时候,总卫生部长贺诚总是拍着肩轻轻安慰她们,陪在她们身边精心嘱咐医务人员照料产妇。而他自己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却留在了江西老区,生死未卜。

除此而外,长征中贺诚一手握着针筒,一手还拿起了枪杆。医生变成了指挥官,这也算是长征的一个创举吧!

后来历经战火考验,贺诚也变得老练了。长征途中屡涉险境,红军许多机关部队都被冲散了,总卫生部也多次突遭强敌袭击,甚至面临被“包饺子”的灭顶之灾,贺诚都沉着指挥,机智突围。只要远远地一听枪声,他就能判断出来袭之敌是老兵还是新兵,是一个团还是一个营。

1933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和李先念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向荒远的川康地区退却。红军过了大雪山后,中央决定分左右两路行进,总卫生部编入张国焘的左路军。

9月,张国焘再次提出南下川康的主张。党中央多次恳切致电张国焘,均遭拒绝。9月下旬,他竟然重新将左路军经草地带回。朱德、刘伯承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张国焘极为恼怒,派人监视朱、刘行动,连他们的马也给偷走了,造成行动困难。后来干脆连电报都不让看了,事实上已被软禁。

形势日益严峻,到底站在哪一边必须作出抉择!在阿坝,张国焘策划的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贺诚代表总卫生部,拒绝出席。

作为红军的总卫生部长,贺诚公然对抗的态度令张国焘十分恼火,他要给这个不服管的家伙一点儿“颜色”看看。

在阿坝,对贺诚的斗争揭幕了。

一天晚上,专门开了一个斗争贺诚的会。会上,一些人凭空捏造罪名,蓄意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说贺诚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工农分子,耍臭知识分子脾气,支持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后已全是一片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在场的一位一方面军的干部实在听不下去,站起来激动地说:“你们这样斗争,只会被反革命利用!”

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张国焘的人子弹立马上膛了!空气顿时窒息般紧张,贺诚危在旦夕。

一旁的刘伯承见势不好,忙说:“今晚的发言我看差不多了,还是请总政委作指示吧!”

张国焘这才干咳两声,将贺诚含沙射影地严词指责一番,宣布散会。

事后,朱德、刘伯承反复叮嘱贺诚:“他(张国焘)还是打着红旗嘛,你们对他不要碰硬,要做细致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影响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随便说话,不要感情用事,也不宜常往来,要避免嫌疑,不要授人以柄。”

在这种情况下,贺诚告诫总卫生部的同志:少说话,不发表什么主张,不随便议论。不求他们,也不得罪他们,只要活下来就是胜利!

尽管如此,张国焘对贺诚还是放心不下,派了六名带短枪的战士监视他,还美其名曰“为了你的安全”。

1936年10月上旬,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南下失利也宣告了张国焘分裂路线的破产。为了彻底粉碎张国焘危害红军的阴谋,朱德、刘伯承派贺诚以领药为名,先去保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张国焘的图谋。

大反攻在即,他日夜操劳,振臂高呼:一切为了伤病员!新中国成立,贺诚第四次同时兼任军、地卫生部门工作

1936年11月,受毛主席委派,贺诚以医生身份送王稼祥同志去苏联治病。

长期过重的心力负重,严重拖垮了贺诚的身体。多年来,从中央根据地到两年艰苦长征,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到伏尔加河大平原,贺诚一路救死护伤,废寝忘食,却没有发现自己已瘦得只剩五十公斤了!

在苏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贺诚一边治病,一边学习。虽然这里的条件比国内好多了,但抗战正急,烽火连天,贺诚无时不渴盼早日回国效力。

1947年,贺诚历经周折,终于回到了日思夜念的祖国,任东北军区后勤副司令兼卫生部长。

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严重威胁着部队。因冻伤引起的非战斗减员大量发生。为了让指战员们尽早奔向杀敌战场,在辽沈决战前,贺诚日夜奋战,响亮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这一口号。同时,总卫生部下发了开展突击治疗两个月,争取让大批伤员重返前线的通知,提出“村村设医

院、户户作病房、人人当看护。转送线长,治疗不乱,伤病员多,管理不乱”的方针。在贺诚的领导下,总卫生部还拟制了《野战卫生勤务条例》,详细规定了连、团、师、纵队到后方医院分级治疗、阶梯治疗等新方案,极为有效地促进了战时医疗保障的完善,为保证辽沈战役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野入关时,除留在东北军区的卫生机构外,仅后方医院就带走四十余所,仅此一点,也可见贺诚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长。

这一时期,他亲自规划和领导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消灭鼠疫、天花、霍乱、白喉四大烈性传染病,以及创建城乡基层卫生保健组织等工作中都发挥出了令人敬佩的才能。他提议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主持制定了军事医学科研方针,全面展开研究朝鲜战场上美军针对我的毒气战、化学战。其中,中国卫生工作发扬至今的“预防为主”方针的提出,尤其是贺诚的突出成就。在新中国卫生系统,贺诚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令人莫不肃然起敬。

一份夸大其词的报告,一次历时二十年的蒙冤,贺诚受到全面批判

正当贺诚壮心不已地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操劳时,厄运不期而至了。

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

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

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

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

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

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

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

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

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

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

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

陈毅同志亲笔写下证明:“我可以证明,贺诚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同志亲自接待贺诚专案组,口述了他的证明:1930年贺诚主持的军委长江五省总交通站被破坏,是由于叛徒出卖所致。贺诚随机应变,脱离了危险境地。总交通站被破坏没有暴露党的其他组织和人员;

王稼祥同志也证明贺诚1936年去苏联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苏蒙的历史是清楚的。

找罪证,却找出了贺诚一系列光荣的历史。邱会作看了材料,气急败坏:“贺诚专案组不是在

办专案,而是在办‘转案’,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然而找不出有力证据,邱会作不得不恢复了贺诚的组织生活和工资待遇,补发了降为战士期间的工资三千多元。贺诚将这笔钱全数交了党费。同年十月,根据林彪的十号命令,贺诚被遣送到太原北郊土堂村。

贺诚独对孤窗,寂然如水。他只有等待,在文革遭难的困厄中,他从容不迫又激情满怀地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多少刀光剑影,多少颠沛流离,多少欢欣失落……最终,他还是在时间的路口等到了正义,足以告慰20年的冷雨寒风了。

邓小平同志生前对给党的高级干部作传是很不提倡的。但是1986年当解放军出版社邀请他为《贺诚传》一书题写书名时,他却欣然命笔。这是对贺诚再次无言的肯定。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25页)授学习,参加《民主与法制》举办的“法制知识竞赛活动”,取得了合格证书。他写的申诉信,文笔流畅、语言华丽、旁征博引、富含哲理,正如后来为他的命运奔走呼救的新华社记者兰学毅说的,读他的申诉信就像读一篇优美的散文,亲切感人、打动人心,没有见面就大体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同流“胡杨泪”感动记者,新华社内参惊动中央

1983年11月的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孟晓云的报告文学《胡杨泪》,主人公钱宗仁的坎坷命运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关注,而在新疆建设兵团劳改的蔡忠平更是激动万分。他迫不及待提起笔,给这位主人公写信,讲述自己蒙受的冤屈。信寄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数学系,钱宗仁看后更是激动万分,一种强烈的同病相怜的责任感,驱使他也迫不及待回信给蔡忠平,向他介绍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

这位名叫兰学毅的新华社记者,看到钱宗仁转来的蔡忠平的万言申诉信,不禁拍案而起。他马不停蹄地从乌鲁木齐,赶路近千公里,来到和静县蔡忠平所在的劳改场。他一身沙尘包裹,却顾不上擦洗,就和蔡忠平谈起来,一连三天三

夜。采访完毕这个“反革命”犯后,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赶回乌鲁木齐,连夜写出一篇两千字的内参:《一个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的申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篇内参后立即作了批示,胡启立、陈丕显、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也都相继作出批示。蔡忠平一案经一年多复查,终于水落石出、重见天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蔡忠平获得平反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即给落实政策,第一份工作安排到劳改一支队教育科工作,一年后又调到兵团城建处工作。但他这时最想的还是读书,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苦难皆由读书而起,现在终有机会,如读不成书才是终身遗憾。

从此,蔡忠平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用,一下子报名参加两个专业的学习,出狱后的短短几年内,他同时取得了两张大专文凭。而他做到了读书工作两不误,本职工作非常出色。喜事一件连着一件。1991年11月,组织上批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新党员。同一年,他评上了经济师(中级职称)。他被调到了《新疆经济报》,欢欢喜喜当上记者,还被任为部主任。1993年,他调回福建老家,任《福建科技报》副总编,2006年被评为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

• 陈 健

(一)

王唯真的生命之火,在几度明灭之后,终于在2006年5月6日熄灭了。

他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惊叹。多少次了,觉着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出奇般地又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患过癌症,两次开刀;他有肺病,长期服药,还有心脑血管病、小脑萎缩病等等,无数次住院治疗。由于从热带潮湿的东南亚移植到风沙干旱的黄土高原延安,因气候水土的关系,使他终生患一种名为鼻甲的病症,十几次做切除手术。三年前,他摔了一跤,我去他家看望,他躺在医院用的那种能起落的病床上,两腿打了石膏,高地悬架在床的两帮,一条胳膊也打了石膏,不能动弹。人本来就瘦弱,这时越发瘦弱了。我回家对老伴周原说,老王这回可能真的站不起来了。时隔月余,他和夫人陈萍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一时无言表达我的惊愕,只是站在那里,紧紧握住他的手……

王唯真住在三里河,在皇亭子过党的组织生活,八十几岁的人,往返于两地之间,经常是乘公交车。他家中的摆设几乎和一般居民差不多,没有一样奢侈品。他搬到三里河的房子是旧的,也不装修,大门坏了,总社派人帮助钉一块铁皮,就凑和了。他从来没有装修过房子,夫妻俩连小时工也不用,一切家务琐事都由自己打理。王唯真行政十一级,陈萍也是离休的老干部,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生活应该比较宽裕,他们如此艰苦朴素,我原以为是老同志贯有的老传统,后来,当我了解了王唯真和王氏家族的历史以后,才悟出这是出于他的信仰。

他这次突然犯病,就近住到铁路总医院,我去看他时,已是病危时刻,但也不像先我去探望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已经昏迷。他认出我。陈萍说,上午医生给他注射了贵重针剂,现在有了出奇的效果。我弯腰伏在他耳边说:等你病情稳定回到家里,我去和你聊天。根据以往的经验,陈萍认为这是他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凭直觉认为情况不好。我哭了。

我和王唯真的相识相交,是在黑云压顶,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是总社代理社长。我能忍受丈夫周原被打成右派后物质条件的匮乏,却忍受不了批斗挨骂、限制自由、强行劳动和无处不在的精神虐杀。一天夜里,我冲出分社大门,像囚犯越狱、一头受伤的牛窜出牛棚,逃到北京,闯进王唯真的办公室呼求:王社长,你要救我……”

(二)

我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被迫走向与一个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暴政挑战的道路,几行简单的文字,说不透我以死相拼的愤慨和胆量。

我是普通记者,文化大革命本来与我无关,却与周原有关。虽然,文革中的斗争对象,是上上下下的当权者、是毛泽东时代的受益者,但被这些当权者、受益者在过去十七年里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千百万受害者也列入斗争对象,且把二者捆在一起戕害,对后者揪斗之惨烈往往超过前者,大有清算几代,连根拔除之势。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发动和领导的,而是长期的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时产生的一个怪胎。

我和周原当时都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打成右派后，在劳改中差点饿死。几年后回到分社，第一篇报道就是新乡县刘庄的支部书记史来贺，这篇长通讯刊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发社论；第二篇是通讯《管理宽》，我定好题目采访一半，因客观原因交给周原采写，总社来的冯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对此很有兴趣，由他俩共同完成；第三篇就是他和穆青、冯健署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三篇东西当时在河南、在全国都引起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焦裕禄引起轰动。这些成绩并没有使分社领导人对周原手软。文革一开始，他以为1957年又来了，首先把周原和我抛了出来。不久运动转了向，造反派又把这位分社领导揪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可以松口气解放了。不然，分社造反派头头一手揪着分社领导人，一手揪着周原，在院里一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他一巴掌打到周原脸上，周原踉踉跄跄站立不住。他们知道周原是烈士的后代，多

位长辈死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却命他站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罪名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以上的迫害还属共性，下边的个别却把周原推向绝境。焦裕禄这篇通讯，被兰考的反对派宣判为“大毒草”，他们成立了揪斗三名作者的战斗队，一批批红卫兵来分社揪斗周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全国的这篇大通讯，关于它的采写情况，口头向外介绍由作者之一的副社长穆青，文字介绍由另一位作者冯健，周原倒落个清闲。现在一说是“大毒草”，铺天盖地的“罪名”压向周原。周原对兰考的造反派说：这篇通讯是三人合写的，有三人的署名。“他们说：经我们到北京调查，这篇通讯主要是你采写的。”

为了配合兰考的斗争，造反派头头锣鼓喧天拉着周原游街示众。他们如此百般折磨周原，是他还有个“把柄”在他们手中攥着。周原五七年因为说实话写了三门峡的内参被划为右派，由于“秉性难改”，劳改时又说实话定罪为“攻击三面红旗”，再次遭到比五七年更严酷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周原举刀砍断了自己的三个指头，写了“断指血书”，这在当时叫反党。他们把周原拉到大街上，强制他举起断指的那条胳膊，向围观的群众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了大毒草焦裕禄。”我冒死跟在离周原不远的一群人中，怕他被乱棍打死。游街示众后，造反派头头不让家人知道又把周原送到一个“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残酷批斗、强制劳动。在这之前，他们还把周原的母亲——一位年迈体衰的烈士的妻子赶出分社。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用文字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我必须争得人身自由，才能寻找我的家人，保护孩子不流落街头。但我没有人身自由。我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被强制性地扫大街，擦洗厕所，搬砖搬瓦，随时随地被抄家、被批斗、被训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社有报道任务下达时，由女造反派头头押解我下去采访，稿子写好交给她继续劳改。我唯一的“罪名”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

一天深夜，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里最显眼的地方，大意是警告造反派头头：你们



王雨亭

要是跟踪我、抓捕我、限制我人身自由，一切后果你俩负责，我现在要去北京告你们。

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共几十人，办公室和宿舍在一个院子里，进出口只有一扇大门，看管大门的是一位姓张的老人，大家叫他张大爷，他住的一间平房和大门紧挨着，晚上没有人出入时大门由他落锁。从五七年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对周原和我都十分同情。我贴好大字报，推开张大爷的门，他和张大娘披衣坐起吓得直哆嗦。我说：“张大爷，快给我开大门，我要跑。”这正是一月底或二月初，最冷的时候。张大爷说：“兵荒马乱，天寒地冻，你往哪里跑？”我说我去北京告他们。张大爷还想劝我，我没有心思向他解释，求他快穿衣服。他因为又冷又惊胳膊伸不到袖子里。我帮他穿衣时，告诉他，我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如果造反派头头逼你太甚，你就说我砸开你的门，在桌子上拿走钥匙……正当张大爷打开大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又扭过头乞求他：“天亮时，请张大娘偷偷去我家看看三个孩子，叫他们不要怕，说妈妈三五天就回来。”张大爷猛推我一把：“快跑！”

分社离郑州火车站有五六站，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这时已经没有了。我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大厅，在一个角落处软瘫下来不能动。我的毛衣毛裤连着内衣因出汗湿透贴在我的皮肤上，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在发烧。那时，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晨。我等到天亮爬上火车，天黑时在总社招待所门口，因没有带任何证明不准住宿而蹲了一夜。在分社我已有几天几夜没有吃好睡好，此时整整两天两夜不进茶水饭粒，我走到王唯真的办公室，已经难以支撑了。以上这一切细写起来要很多文字。总之，我闯进了王唯真的办公室：

“王社长，我是从河南分社偷跑出来的，已经没有了退路，你要救我。”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谈了我一家的遭遇。王唯真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水，抓起桌上的电话要政工组的苏群，他请苏群给河南分社打电话，他说：“第一，陈健同志到总社来反映分社运动情况合理合法；第二，她是普通记者，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对象；第三，她来北京的往返路费回去要给她报销；第四，分社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限制她人身自由、强制

她劳动，她回去应正常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苏群，或是给招待所打个招呼，或是给她写个便条，她现在急需住下休息……

我回到分社，上述意见都落实了。这件事轰动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所属单位的所在区。分社周围的新闻、出版、电台、文艺、社科院等单位，有我好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原先的处境一样，认为是“漏网”的右派，当我的这些朋友还没有“解放”，知道我“凯旋”归来，暗中串连、奔走相告，王唯真的大名也不胫而走。

最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碰见大人、孩子不敢抬头。妈妈没有出入大门的自由，奶奶被赶走，没有人给他们做饭。现在妈妈能按时让他们吃饱。小小的年纪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兴。

文革八年，河南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轮流坐庄，我们的处境时好时坏，当周原为了焦裕禄这篇通讯要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1963年，穆青命周原向河南省委汇报豫东之行，主要汇报焦裕禄的事迹和宣读他写的通讯初稿时，听汇报的就是纪登奎，但纪说，我和老焦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了解他，不用汇报了。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嘛！”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

虽然，我和周原与王唯真友谊的建立，是文革中的这次解救。由于我们在河南，他在北京，后来我们一家调到北京，又由于住处相距很远，来往交谈不多。这些阻隔并没有妨碍我们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一位可交心交底的老同志。

（三）

王唯真祖籍福建省，上个世纪，先辈们远离故土，携儿带女去南洋创业。他们足踏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国家，最后定居在菲律宾。王唯真的父亲王雨亭老先生是一位颇有见地、富有入

道主义精神的华侨儒商,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王雨亭年轻时目睹华侨在异国他乡创业之艰辛、所受的屈辱,所在国家贫苦群众和华侨相同的命运,曾创立了平民党,办有《平民日报》,誓为天下没有地位的平民百姓争得温饱和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后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中国最早的同盟会会员,积极参加并资助过辛亥革命。孙中山很器重他,多次派他回国发展同盟会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从日本回到菲律宾,先是任陈嘉庚庞大橡胶园的主管,他的才干和人品很得陈的赏识。后来他受梁启超“人群之镜”的办报思想影响,先后创办四家报纸,一个电影公司,向世界华侨宣传共和思想,宣传华侨的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电影公司还向世界华侨介绍苏联的和三十年代中国的进步电影,他的《前驱日报》和美国华侨办的《华侨日报》、法国华侨办的《救国日报》齐名为世界华人最受欢迎的三大报纸之一。日本鬼子侵入东南亚,他的报纸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因此被当地政府逮捕入狱。由于世界许多华侨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事件,王雨亭老先生才被释放。香港的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位爱国爱民的华侨儒商,更看重他和华侨富商陈嘉庚、庄希泉等人的关系,吸收他为中共党员,介绍人就是当时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连贯。从此,王雨亭在党的指引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侨巨富一起,动员组织一批批爱国华侨或他们的子女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不少人去了延安。另外,他协助陈嘉庚等一批东南亚的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斗争中,出钱出力,他们的杰出贡献,已为国人所共识。

1949年6月,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庄希泉、王雨亭作为世界华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委员。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共同纲领》,当时被叫做“新中国的大宪章”。这个宪章确立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此时的王雨亭,个人的事业、财富已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投入到振兴贫弱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中,这是他的“梦”,这个梦从结识孙中山先生时就开始了。现在,梦已成真——或者说梦的纲领蓝图已呈现在

眼前,这可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斗争的结果啊!

会后,他回到菲律宾,把所有财产捐赠给有关机构,带领全家老小回到祖国。

王唯真承传了父亲的思想理念和做人做事的准则,又兼有他母亲的虔诚。他从小学到高中读的是教会学校,由于多年的唱诗班的熏陶,给了他美学和音乐的启蒙。独处时,他喜欢哼几句忧郁的小夜曲,音量委婉、音色很美。他十二三岁时,利用课余时间在他父亲的报馆里,为报纸做木刻做插图,很受读者赞赏。十四岁时,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要求去延安,他父亲劝他多学习知识充实自己。十五岁那年,因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被警察跟踪。王雨亭老先生亲自把他送到香港交给地下党。父亲给儿子的临别赠言是一大篇豪言壮语,主要是:“这是个大时代,你要奔赴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线,我决不会因‘舐犊之情’忘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勿忘我平时的教诲,锻炼体魄,充实知识,为新中国的事业作好准备,别矣!真儿。”党组织由香港经越南、昆明至西安,途经八个月才把王唯真送到延安。这时是1938年10月。

(四)

王唯真由于英文好,解放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采访。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像现在,他去的国家有的还没有建交,记者生涯十分艰难,甚至有几分危险。有时他出国和妻儿拥别时,有一种生死离别之感。1964年他在巴西采访时,由于军人政变,他和其他八位同志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绝食斗争,表现出中国人的勇气和尊严。后经巴西有良知的律师的辩护和人民的声援,获释回国。文革中,他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中央有红头文件,是陈伯达到总社宣读这项任命。陈后来被定为四人帮集团的成员,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陈伯达当年在印尼时,是王雨亭朋友的一名下属,王老先生知道他的身份后,曾保护过他,救过他的命。他俩的活动不在一个层次上,特别是王雨亭入党后,他的工作范围(或者说统战对象)多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富商。后来,也没有发现王唯真和四人帮有任何瓜葛。他的追悼会开

得很隆重,在介绍他的悼词里,评价他在代理社长时做了三件事:(1)保护了干部;(2)保护了新华社的珍贵资料和图片;(3)使新华社的工作正常运转。

王雨亭老先生死于文革,但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他的儿女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对他是致命一击。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1957年被划成右派,差一点饿死在劳改地北大荒,文革中又送去劳改;王唯真的姐姐王双游夫妇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革中王双游被斗、养猪、挨饿、受尽折磨与屈辱,后死于胃癌;她的丈夫“文革”中入狱七年,受尽折磨,死在狱中;王唯真最小的弟弟王应凯,“文革”中先是被捕入狱,在非人的折磨下精神失常,后又转入疯人院,直到粉碎四人帮。

王唯真在代理社长期间,同样遭到残酷的迫害:批斗、打骂、抄家、侮辱,长期审查,失去自由,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加重了病情的恶化。王雨亭老先生弥留时,他的许多子女不在场。王唯真也不在场。他最后一句话是:“他们给唯真贴大字报啊!他们给唯真贴……”

有一个问题使王氏父子长期不解,王雨亭回国后职务为侨联秘书长,不知为什么只给他两间简单的平房,一间和他老伴同住,一间是保姆兼厨房。不知是不屑于物质待遇的争取,还是不敢不愿向上级反映?王雨亭从来无法在家中接待任何亲朋好友。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家人都得到平反改正。这时,王唯真才知道,他的父亲原来是长期被控制使用。据说,王雨亭的葬礼却开得很体面,大概是人已经死了,用不着再控制了,隆重的葬礼显示党和国家对他的尊重。

(五)

多种渠道形成的王唯真的思想理念,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的影响,他的文化素养、视野、胸怀和虔诚,并没有使他变得复杂难以沟通。新华社的两位老前辈彭迪、庄重,前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单纯。”后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厚道。”王唯真受父母的影响,也许还包括遗传基因,他除却上述的优点外,还具有在共产党人中少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前边说过,王唯真的艰苦朴素,不是来自



王唯真

老传统,而是来自他的信仰和做人的良知。抗战时期,一批批爱国华侨回国参加抗日,有的去延安,有的参加国军。参加国军的情况我不了解,参加共产党的,包括解放初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难以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厄运。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这些回国华侨不论遭遇如何,都很难和海外的亲人通讯联系,更不能得到他们的经济援助。侨联下设一个“扶危济贫”机构,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难侨。父子俩尽一切可能捐款救助。有人捐几十几百元,他们能捐一千元。除此之外,他们还随时随地对个别难侨或他们的子女给予经济上、物质上的救助。新华社黄亭子有一对贫病交加的中年夫妇,男的叫小龙,女的患癌症。小龙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回国的华侨,他和妻子早已过世。小龙夫妇每天在黄亭子大院里拾破烂、拣垃圾补助生活。王唯真经常给他们一些帮助。有一次他看见

夫妻俩在垃圾箱里扒破烂,立即倾其所有,把浑身上下口袋翻了一遍,搜出了五百多元全部给了他们,连他自己乘公交车的钱都没有留,只好徒步从黄亭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三里河家里。几十年来,从王雨亭到王唯真都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他们把节省下的工资都用来救助难侨了。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道义、一种责任。对于千千万万难侨来说,也许是杯水车薪,但在饥饿的年代,在饥饿和专政双重挤压下的人们,哪怕是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物质帮助,也许就可能免去饿死的威胁。

王唯真病故后,家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他一生的积蓄——四千元人民币。王雨亭老人生前没有给老伴儿孙留下分文,时间走到二十一世纪,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王唯真留下了四千元,也许它只够几位新贵哥们一顿便餐,但陈萍很看重,她要把它分给儿女们,儿女们说:“妈,这是爸留下的遗产,该你自己享用。”陈萍先是苦笑,后来哭了。

粉碎四人帮后,逐渐解冻,东南亚的华侨也逐渐能回国观光、探亲、投资,也有些是寻找已死去的受害者,他们是自己的父兄、子女和其他亲人。五七七年被打成右派差一点饿死在北大荒的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就充当向导,带领他们去北大荒认一认就地掩埋的死者的坟茔,讲解当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饿的惨状。

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一本书中谈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认为中国比苏联的优越条件之一,是有系恋着祖国的四千万华侨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富有、很会理财、很会经营。他指的是改革。实际上从孙中山推翻满清到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侨对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看过十本以上华侨对国家贡献的书籍和资料,却没有看到一本书写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牺牲。

我前边说过,王唯真逝世后和追悼会前的十多天中,我多次给陈萍打电话慰问,有一次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突然地问了一句:“王唯真生前是否很痛苦?我指的不是犯病的时候,是在正常情况下。”她哎呀一声说:“他痛苦时白天茶饭不思、夜里辗转难眠,他说,有无数只手拧他的全身,从皮肉拧到内脏。”后来红红也告诉了我类似的情

况。我认为王唯真的痛苦包括着巨大的思想矛盾和心理矛盾。这矛盾的内涵还包括他的父亲王雨亭。王老先生回到祖国在最初的激动自豪过后,他的经营理念、办报思想根本排不上用场,还和现实相悖逆。加以他把共产党人理想化,他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一些干部格格不入,后来和海外华侨也渐渐失去联系,他的一群子女又备受摧残,他的痛苦究竟有多深?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王唯真知晓。他认为他的自传在华侨中很有代表性,但又苦苦写不出来,这不仅是他逐渐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对王氏家族的兴衰历史,家族成员的命运,他个人的思想情操,在现实生活的碰撞下,找不出一根思想链条串成语言文字,成章成书。

王唯真在多种疾病的折磨下苦苦挣扎,想延长生命,完成宿愿,他却遗憾地走了。他的女儿红红,在她父亲葬礼后就退休了,她要完成她父亲的遗愿。她不仅要整理父亲遗留下的断简残篇,她还要去故乡福建(家乡财产也捐赠给政府了)、去先辈们创业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是寻找失落的财产,是寻找几代人失落的历史。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为老干部创造了一个闪亮的词儿叫“两头真”,已被广泛认同和运用。说的是有些老干部,起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共产党,经过漫长的崎岖的人生坎坷,到老来又回到起点重新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老干部固然可尊可敬,但毕竟是少数。我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王氏父子是否“两头真”,但他们的“一头真”也真得令人肃然起敬。

王唯真弥留时,我去医院看他,选了几支白色的百合,外用淡紫色纱纸裹装,陈萍举着花束对着他,他凝神看着花,两眼清亮有神,脸上放出奇异的光彩。这是回光反照,我被感动了。我对病床前的男孩说:“你外公年轻时可是一表人才!”陈萍接着说:“他现在也是一表人才。”王唯真最后留下的,留给他的亲人们和友人的,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陈老总落难石家庄

• 赵淮青

每当我路过香山知松园,看到镌刻在那块巨大石碑上的陈毅元帅的题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便情不自禁地缅怀起这位青松般高洁的人物。

1970年初夏,“文革”乱到极点,社会秩序开始少有好转,我奉调从西宁新华社青海分社来到石家庄新华社河北分社。平心而论,我对石家庄这个城市兴趣不大,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古老而有特色的建筑物,连条一般城市常有的河流也没有,除了白求恩墓之外,简直找不到像样的名胜古迹,让人感到缺少历史的积淀和韵味。但我一到河北分社,一位同事便告诉我,陈老总如今也在石家庄,被下放到石家庄车辆厂。这个消息倒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对石家庄似乎也刮目相看了。

记得是1968年春天,在新华总社举办的各分社部分工作人员“学习班”上,军管小组曾经批判“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等革命元老,但不知为什么,尽管他们骂得唇干舌燥,这些老革命非但未被批倒批臭,名声反而越批越清扬,这恐怕是那些“四人帮”们始料不及的吧!

新闻记者的耳朵长,消息灵通,就在我们的“学习班”上,所谓的“二月逆流”的真相已从各种渠道传来,加之人们善于从当时流传的《红卫兵小报》上所载奇文,作反说正解,几乎什么“机密”也保不住的。大家终于明白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究竟是咋回事。原来是,

在1967年2月间,陈老总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叶帅、徐帅、聂帅,还有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在怀仁堂和京西宾馆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劣迹,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和极大的不理解。他们反对打倒一大片老干部;反对停工停产“闹革命”;反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弄了一批不懂事的娃娃打头阵”;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实行打砸抢,往死里整。他们实在不能容忍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指使红



1969年陈毅在石家庄

卫兵,把凡是真、善、美的事物,统统置于摧毁之列,把好端端一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天下大乱,大好江山搞得满目疮痍。他们舍得一身剐,站出来说话了!特别是让林彪、江青之流听了跳起来的是,陈老总竟旧话重提,说“延安整风”是整人不择手段的左的风源,还提到应该接受斯大林种种倒行逆施的教训等最敏感的问题,被当时一些红得发紫的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伙加油添醋,肆意挑拨,报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二月逆流”被铁板定案。陈老总被诬为这场所谓“逆流”的“黑干将”、“黑司令”。当我们离开“学习班”之后,又听说,在党的“九大”期间,上海的黑秀才又搞了个什么《陈毅黑话录》,于会间广为散发,结果陈毅被排挤出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头衔。这位曾经统帅百万雄兵,威震敌胆的元帅,于1969年10月,以“一级战备”为名,被发配到石家庄一家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到石家庄几天后,曾骑车来到市区西部陈老总的住地——桥西烈士陵园隔壁的“小白楼”招待所,当然无缘与他相见,只在门前漫步徘徊多时,却根本不见什么“小白楼”,而是个灰砖平房组成的破败的院子,院内杂草丛生,树木零落,据说原先是一处弃而不用的幼儿园。我在墙外伫立良久,怅然而返。心想,我们敬爱的陈老总确实是被发配流放,削职为民了。

从“文革”之后的揭秘档案中和出版的书报上,更使我逐渐醒悟到,陈老总本来是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南海的,条件是对“文革”少发议论,甚至不要开口。这是祸国殃民的江青曾一而再地示意过的。但陈老总根本不听这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他曾在一些场合表过态:“都快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也曾义愤填膺地说过:“那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被整死了,自杀了,再不说话,老是哼哼哈哈,我这个共产党员便一个铜子也不值!”在一次会上,他还说过:“‘八大’政治报告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怎能叫刘少奇一人负责?就是毛泽东在场,他也照说不误,比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仗势欺人,指着鼻子训斥刘少奇,声色俱厉地骂他镇压了革命小将,让他到清华大学当众检

讨。此时此刻会场上噤若寒蝉,而陈老总却开口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妥。派工作组是当时的困难局面造成的。他去清华,下不来台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有错误可以在我们这个会上批评嘛!’几句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许多人都为陈老总的命运捏着一把汗,为他担着一份心。而陈老总初衷不改,该说什么照样说。他又对归国留学生说:‘把朱老总说成是大军阀,把贺龙同志说成是大土匪,这是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给对外使节戴高帽子,要他们在外国人面前弯腰撅屁股,这是伤害我们国家的尊严!这种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的事,我当一天外交部长就不能答应!’……陈老总这些不顾个人安危、掷地有声、正气凛然的话都被记录在案,不知感动和教育了多少心有良知的国人,也气得江青之流跳起来,自然也埋伏了他个人多舛不幸的命运。

当陈老总到达石家庄车辆厂之前,厂军管小组曾接到河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大意是:陈毅要到你厂调研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你们要向大家讲清楚,此人一贯反对毛主席,是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人物,他参加党的“九大”,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的,他来后,厂里可为他安排一个办公室,一周上三个半天的班,与工人一起参加活动……

有一天,陈老总穿一身蓝色的干部装来上班了,他到车间与工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喝着工人递过来的搪瓷茶缸大碗茶,与工人们谈笑风生。人心是杆秤,不论上边怎么指示,工人们老总还是亲热的。老总通过谈家常,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班组会上,大家爱听他的发言,总是忘记“他讲话不要鼓掌”的上级指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开头,有的工人称呼老总为首长,他马上制止:“不要这样叫,我是一个老兵,叫我陈同志或老陈,不是挺好吗?”

那会儿时兴毛主席指示贯彻执行不过夜,我们分社女记者韩舞燕去这家工厂了解有关情况,有幸见到陈老总。只见他坐在小会议室的角落里,只抽烟,不发言,但小韩觉得老总那张脸还像从前一样威仪俨然。厂里有位刘师傅也曾对我说过:“陈老总的处境虽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但他襟怀坦白,感人的真诚没有变。”老刘还说:“我与他说话很投缘。有一次老总问我:在厂里,你是

哪一派呀？我说：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一派，保皇派。‘老总接上说：我也是保皇派，最大的保皇派。’说完嗨嗨地笑起来。记得老总还说过：‘我总认为，如果中央有人犯了错误，领导层用开会的形式，也可以解决嘛！为什么非要搞这么一场运动呢？实在不理解。’

我到石家庄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全省先进单位——正定县三角村生产大队。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小刘曾对我谈起陈老总到三角村参观的事，令我感慨良多。他对我说：‘陈老总那次来，是我接待的，可以把全过程讲给你听听。’

有一天上午，村前来了一辆灰色小汽车，最先下来的是张茜同志，她微笑着对大伙儿说：‘陈老总向大家学习来啦！’她这一说倒把我的脸说得火辣辣的，因为我们中间，除大队领导外，县上领导一个也没有，我算是最大的‘干部’啦。接着陈老总也笑眯眯地下车了，我觉得老总的脸色不算好，不像照片上那么精神了，车上只有一名司机，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们把他们请到大队会议室，没有准备烟茶，只有大碗白开水。对这种接待规格，陈老总并不介意，依然说说笑笑，挺和蔼的。我抽的烟是两角六分钱的上海‘飞马牌’，想敬老总一支又不好意思，倒是老总先开口了：‘小同志，你抽的是什么烟呀？’一句话使我明白过来，老总大概没带烟，赶紧给他敬了一支‘飞马牌’。老总接过烟，又掏出一元钱，请队里人到村供销社去买烟，买来的是郑州出产的两盒‘前门牌’烟，他给在座每个人递了一支。他的表情挺亲切，说的四川话大家也能听懂。记得他还就近到庄稼地看了看，走访了几户社员，我们也没给社员介绍他是谁，他看到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生活依然很苦，心中不是滋味，这从他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来。

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县位于太行山麓，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晋冀鲁豫地区129师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战斗的地方。陈老总来到这里，像旧地重游似的，处处有战友的足迹。我在赞皇县听说，当地领导对于陈老总并不管‘接待要低规格’那一套，使他感到宾至如归。赞皇县出产的大红枣，肉厚香甜，远近闻名，县里要送他几斤，老总一定要自己掏钱。消息传到省里，不料那位‘文革’初期奉命接管北京市委，后

来成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北王’大发雷霆，说什么‘他陈毅下来是接受改造的，下乡去买的什么土特产呀！’有人对我谈起这件事，使我想起“龙困沙滩，虎落平阳”的故事，心想省里这位领导也是个老革命了，假如还有点正义和良知的話，对当年这位叱咤风云，为党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的目前处境，即便不能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明打明地加以保护，也该在暗中给予同情和关爱吧，怎可火上加油，相煎太急呢？可惜他只唯上，不唯真，向轻点说，也许是缺少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吧，嗟乎悲夫！

平山县的干部告诉我，陈老总到石家庄后，第一次下乡是到西柏坡。在那里，他没有受到冷落，没有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使他心里暖烘烘的。他见到村干部像见了亲人，与他们一起吃了庄稼人的饭，喝了庄稼人的酒，像‘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样。他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也许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话也多起来，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哪！’嘴角却有几分不易察觉的轻蔑，一位上岁数的村干部应对道：‘你陈老总是甚样人，谁不知道呀！你可是有大功劳的人哪！’当陈老总返回石家庄时，刚走出村口，就被在田间劳动的乡亲们认出来了，大家把他围起来，每个人都想对他说几句话，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的汽车转过山脚。

夫人张茜在石家庄制药厂劳动，她回到住地还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加之精神压抑，身体愈加羸弱，强打精神支撑这个‘家’。当她要拆洗被褥、床单这些大件时，老总也来打打下手，可惜没人把当时这些‘景观’拍摄下来。

陈老总这一生，多次被贬，多次蒙冤，所受诬陷和冷遇数不清，但每次都不能把他打趴下，而且越战越强，百炼成钢。在北京，在副总理、外交部长的岗位上，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忙得喘不过气来，恨不能把一天变成48小时。而在石家庄，鬼也不上门，电话铃声难得听到，文件也看不上。他有时拿出几本唐诗宋词来翻翻，在走廊上走走，听墙外凌厉的寒风，看窗外萧疏的云树，哼几句年轻时爱唱的歌，比如《马赛曲》什么的，以寄托青年时代的雄心壮志。而此时此刻，这位有胆有识有战略眼光的元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变得孤陋寡闻。虽少言寡语，却忧心忡忡。大

家知道,陈老总爱好诗词,爱读也爱写。在石家庄那些日子,他偶尔也吟咏自己过去写过的诗,比如那首《赠同志》:“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能有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去绽春蕾。”还有那首“文革”初期写的:“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这些诗穿过岁月风尘,包涵着无穷的追忆、沧桑和感慨,都是他喜欢温故而知新的。

尽管陈老总一生中受过多次大的打击,但他无怨无悔,宁愿承担自己光明磊落的言行所造成的一切不应有的后果。如今他似乎已经抛弃了一切个人崇拜和尊崇,放弃了一切权势和荣辱,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切本不该接受的命运安排。但他绝不依靠哪方神圣的恩赐,更不屑看谁人的眼色行事,有的只是博大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夜深不寐时,他时刻挂念着他的孩子们,更挂念着少奇、贺龙、陶铸……以及所有共过患难的战友们。如今他们栖身何处?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使他忧心如焚。祖国这条大船何时能端正航向呢?!

在北京,在“文革”中的头两年,陈老总没完没了地被批斗,被“砸烂狗头”,但从不下他那英雄的头颅。中国共产党要向何处去?这位从来对祖国的命运怀有强烈使命感的人物怎能不霜雪满头,身染沉疴呢?1970年六七月间,他开始腹泻肚痛,有时夜晚痛得醒来。张茜焦急万分,而老总还大咧咧地说:“你愁个啥,会挺过去的!”

1970年9月下旬,陈老总接到要他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只能带病前往了。未料这位从“桃花源”中来,对上层政治斗争所知甚少的人,又一脚踏进陷阱里。在会上,他被分配到“华北组”,看到有几位不指名的骂狗头军师张春桥,他也气不打一处来,骂上几句,听

到有些人在发言中希望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也随声附和,谁知又“站错了队”,真是动辄得咎,出口就错呀!

政治上的“雪上加霜”,加重了他的病情。当时林彪同伙黄永胜还在台上,他向黄请假回京治病,被黄粗暴地驳回。回石家庄后,度日如年,张茜这才给周恩来写信,周总理指示:尽快回京,径直直到301医院。动身那天是1970年10月20日,陈老总从此离开了那个给他留下许多不愉快记忆的石家庄。可是谁知301医院当时还被林彪死党控制,他们的政策是:治病要为政治服务,要服从“专案”要求。屡屡告诫医务人员与陈毅划清界限,对他的病采取了敷衍和拖延的卑鄙伎俩。先推拖没有床位,后把癌症诊断为“阑尾炎”,前前后后耽误了整整半年时间。当1971年确诊为结肠癌时,病情已经是晚期,错过了有效的治疗期,周恩来总理虽然采取了多种抢救措施,也回天无力了。

1972年元月初的一个早晨,天还麻麻亮,有人敲我的门,站在门前的是著名中医大夫蒋伯鸾老人,此人在针灸上有不少绝招,是天津妇孺皆知的“金针大王”。他阴沉着脸,声音有些颤抖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陈老总去世了。”我的头嗡了一下,两人相对无言。这样一件平常的事,说明人心的向背,说明老百姓对陈老总的深情。(责任编辑 杨继绳)

资治文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主管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江西出版集团共同主办
《资治文摘》月刊,16开全彩印刷
单册定价8.00元,全年定价96.00元
邮发代号80-366,国内刊号:CN11-5301/G2

省长部长想什么?厅长局长说什么?总裁经理干什么?
一册在手,全部都有!



现在及未来领导人、管理者的必读经典

《资治文摘》秉持《资治通鉴》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理想,围绕领导人与管理者的阅读需求,荟萃图书、期刊、报纸、网络中最适宜的书摘、文章、时评、资讯,打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读经典。涵盖资讯、政经管理类、生活休闲类三大版块,主要内容涉及:月度人物、高层动态、人事动态、图片新闻、焦点、民生、财经、管理、论坛、历史、生活、文化。

《资治文摘》强调实用性与可读性,力争给读者提供多维度的思考空间,对于不同领域及层级的领导和管理精英均有裨益。

联系人:周青 高丽红 联系电话:010-65123806/65123855
E-mail: zq_826@hotmail.com gaoli@honglu@163.com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 张家康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校格,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可以作为学术自由讨论,从而聚首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便是由这些人担当的。后来,他虽然和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不愉快的“过节”,但是,他在晚年主事民权同盟、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声应气求、殊途同归。他一生救助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史应该铭记他的不朽功德。

卓 见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后,给大学下了最精辟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他相信各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不应对其存有偏见。他认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应该为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以营造一个多元的思想、学术发展的空间。他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一仍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他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以10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他和陈独秀有过交往,都曾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炸药的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动的手段,推翻满清反动政府,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

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1月4日,他正式就任校长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见其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

于是,激荡旧中国的思想文化革命,便由陈独秀和《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在北大以锋不可挡之势而兴起狂澜。在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新空气。他对北大的文科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是得益于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当即同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二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有些人径自向他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直被作为异端邪说受到排斥和压抑,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



蔡元培

论。

这种容纳异己、兼容并包的思想,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严词恫吓,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已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便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在武人的森然可怖的刀刃面前,他没有退缩,而是针锋相对,为新思潮辩言。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

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

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的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

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向往科学与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李大钊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进行的。1917年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被授予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

青年毛泽东也曾受到过蔡元培的照拂。1918年9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萧瑜、熊民楚、章根弟四人来到北京。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原想搞份清洁工就可以了,没曾想为蔡元培知晓,没有让毛泽东去当清洁工,而是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当助理员。青年毛泽东再也不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学读书、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毛泽东由此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从而为他的早期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夫子大人”,并以晚生弟子相许。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酝酿之中。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北大学生张国焘带着李大钊的口信,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恰在此时,蔡元培也因事来到上海,张国焘出于师生情谊,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看望,告诉蔡元培自己现在住在陈独秀家,很受其影响,并愿意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特来聆听校长的教诲。张国焘回忆说:

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蔡元培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他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说,社会

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当年的北大学生、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生前在《追忆蔡子民校长》一文中说：

蔡先生不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北大不会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党初期的50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的比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和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必然合理性来源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受惠于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和容纳异己的雅量。

过节

蔡元培是个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在寻求救国的方法时，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其理想破灭时，也知道是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所致。然而，他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走的依然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1922年5月，他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又提出辞职的要求，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腐败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职’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万倍’。但是，作为‘贤者’的蔡元培恰恰有着‘消极’和‘非民众’的两个观念的缺点。”文章认为对待恶浊政治的态度：“必须彻头彻尾采取积极苦战恶斗方法，”必须发动“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

工商大民众。”而“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义”，却“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警示和老友的劝告，并没能使他觉醒过来，他还是深信不合作主义。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鲍尔希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

可是，不到二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他竟在致北京大学的电文中说：“间闻过激，颇滋疑虑。请纯用不合作主义促对方反省。……言论上务以平等、公道为标帜，避去偏激名词。”显然，他对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磅礴于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心中多有疑虑，感情上也难以认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便同孙中山等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执意要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政党，在实行党内合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陈独秀对这种与国民党“捆绑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他在与张国焘的一次谈话中，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融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甚至感慨地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这个富有朝气的政党历有成见，总想将共产党融化在自己的组织中，吴稚晖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这位率直的中共领袖竟不假思索地说，尚须20年。于是，吴稚晖便以此造舆论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以求得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对其清党反共提案的支持。3

月21日,邵元冲告诉蔡元培,蒋介石已决心与共产党分离。

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相约邵元冲、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讨论与共产党分裂的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已察觉到国共分裂的暗流,陈独秀为防止老友卷入这一历史是非的漩涡之中,曾约蔡元培相会于亚东图书馆,临别时,陈独秀诚恳相告:“防止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显然,“党外的右倾”,指的便是萌芽中的清党反共的倾向。

遗憾的是,他没有听从老友的忠告,而是身不由己地往斜路上滑行。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议案指出:“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一议案,于10日后,发起充满血腥气的弥漫上海滩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终于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丧身在枪弹刀棍之下。

在人们印象中,蔡元培乃一至善贤者,国人的历史陈述中难以有其清党反共的心理预期。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他作为一位国民党元老,从维护国民党一党一派的狭隘利益出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已呈勃然气势时,他已是心有余悸,再加上吴稚晖等人的蛊惑、怂恿,他终于招架不住了。况且,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直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所以,他的清党分共纯是出于思想、政治上的自觉行动,而不是什么受他人唆使、挑拨的被动行为。

1934年1月9日,他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柳亚子是他的学生,师生情谊亲密,在《纪念蔡子民先生》一文中,对这段“过节”毫不回护,文章说: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

清党运动。

当然,他的清党分共的本意,无非是两党分家。他还试图以“法治”的方式清党分共,全然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大开杀戒,酿成惨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见的桩桩血案,已是惨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保护青年。“四·一二”清党开始,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国民党清党后,各省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他为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浙江的清党一开始便十分严厉,凡涉嫌者,抓到便杀。4月16日晚,仅从陆军监狱提出的20多人,便在片刻间杀尽。他对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将专司此事的人找来,很严肃地说:

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

他毕竟是个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张保障人权,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正是受他的影响,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乱捕滥杀。

楷 模

1931年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牛兰(Noulens)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秘书,暗地担负组织和资助中国工人运动的任务。牛兰夫妇被捕后,在狱中四次绝食,生命垂危。蔡元培与宋庆龄闻讯后,多次过问此事,并且致电国民政府:“请求特赦牛兰夫妇。”不久,陈独秀等人也被捕入狱。蔡元培等又给国民党当局去电报,要求“开其自新之路”。没想到这一纸电文,却遭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警告,称蔡元培等“电请保释,系徇情蔽护,为反动张目。”蔡元培并没被吓倒,竟两次来监狱看望陈独秀,并为再版的《独秀文存》作序。

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邓演达等的实践活动中,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已经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动员国内外一切进步人士参与行动,共同营救政治犯,以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服务宗旨是保障人权;“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

他和宋庆龄等已将营救政治犯的私人行为,泛化为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有组织的社会性行为,并产生出具有影响的作用力。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的得到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和关心。

他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行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作出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应请中央解散该团体,并于蔡、宋等以警告。”反动派不惜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对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恐吓威胁,恫吓不成,便真的下毒手。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蔡元培知道后悲痛愤慨,在去殡仪馆处理善后时,对《申报》记者说:“杨先生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毫无保障。”杨杏佛遇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人权保障活动刚刚出现的一点星光,就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掐灭了。

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蔡元培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斗

争。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他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他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他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肖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九年,这年冬,由于他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时为行政院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却暴露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蔡元培多次劝其改变态度,投身于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次,汪精卫在南京请他吃饭,他在席间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话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泪珠滴入汤盘中,他竟和着汤一道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

他已近古稀之年,身体日渐衰弱,加之患有多年足疾,确实难以承负繁杂的社会工作。于是,他发表启事说:“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资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然而,只要是抗日的社会活动,他还是要拖着疲弱之躯,勉力担当。抗战爆发后,他



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还领衔发表全国大学校长、教授宣言，控诉日本破坏我国文化机关的罪行。

1937年11月27日，他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养病。在香港期间，他仍为全民抗战而奔波操劳。次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展览会，他参观后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他说：

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

9月23日，他又领衔与郭沫若等致电国际联盟大会主席，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制裁。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蔡元培的抗日言行，由衷地敬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气节。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信，提出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22日，毛泽东即给蔡元培发来一函，再提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议，信中说：

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问也。

他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已溢于言表。反之，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心驰神往。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前来拜访，两人亲切交谈，吴玉

章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他听后尤为高兴，为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同抵外侮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

鲁迅生前曾对冯雪峰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愤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确如鲁迅所说，蔡元培对共产党的革命不甚了然，正是因为不甚了然，所以，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产党革命的真实情况。1939年8月，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他对毛泽东论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关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7日，毛泽东即发来唁电：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子民先生家属礼鉴：子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3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来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精确、崇高的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缅怀和纪念这位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哲人和先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

• 戴澍霖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
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
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
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
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
《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经两部奉令查明》
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
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
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这使我们很纳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我们的口头
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怎么也骂起宋子文、孔祥熙来
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百思莫解,只有把这当作一个
谜,待日后再探究吧!

1949年4月,强渡长江,南京解放。我从《中央日报》
我方地下党的同志和一些想方设法坚决留在大陆而拒去
台湾的报社工作人员口中,才摸清了这档子事的原委。

原来那时《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
是个直性子,外号“天声”。他曾受肖乾引导,做了新闻工
作。他主张“先日报,后中央”和“新闻第一”。1947年夏,
孔祥熙、宋子文以“扬子”和“孚中”两公司的名义,向中央
银行结汇3亿8千多万美元(当时美元与黑市价相差十多倍),
从国外购买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器材等,运到
上海抛售,牟取巨额利润。当年5月,在国民党的“国民参
政会”上,素有“黄大炮”之称的贵州籍参议员黄宇人为此
开了一炮,并吁请当局从速彻查,惊得与会参议员都面面相
觑。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
俞鸿钧答复这一质询时,开口闭口都是“最高当局”的
“意思”和“指示”如何如何,驴头不对马嘴。这使得当时在
会上采访的陆铿非常气愤。他一回到《中央日报》,就布置
全体记者,集中全力设法搞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最后
终于在青年党人陈启天主持的经济部里,将财政部和经济
部的调查报告,连骗带偷地弄了出来。他随即发动好几

个记者、编辑加紧誊抄,连夜派人将原件送还经济部商业
司司长邓翰良。第二天,即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
报》第四版头条就刊出了那样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中外
轰动。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都纷纷转载,外
国驻南京的记者也将这个消息传到国外。宋美龄为此大
耍美女之威风,一定要蒋介石追究责任,否则就和他离
婚。

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在黄埔路的“官邸”,召集紧急会
议。蒋介石在会上泼口大骂“娘希×”,一定要追究责任。
同时,老蒋和他的“智囊”们还作了各种分析研究:这是个
人的职业冲动,还是政治阴谋?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
争,还是共产党人在其中捣乱?当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判
断:可能是尾大不掉的陆铿等人的职业冲动而胡干的。但
老蒋不相信,决定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副
部长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名义,直接
找陆铿弄清消息来源,然后再作处理。

经过两次谈话,陆铿坚决表示新闻记者有不泄露消
息来源的义务,并说这是必须遵守的信条。至于发表这消
息的动机,完全是为国民党着想,而不是使国民党更坏。
至于蒋介石说什么他是“总裁”,陆铿是党员,他以“总裁”
的身份命令陆铿立即讲出消息来源,陆铿回答的是:“那
好,我马上退出国民党。”

这两次交谈后,陆铿接着就打起了小包袱,准备坐
牢。8月2日听说李惟果驾车来到《中央日报》楼下,陆铿
即拎着包袱下楼。李惟果一见这模样,就问他这是干什
么,他说准备坐牢。李惟果说:“瞎说!总裁要亲自问你!”

李惟果边说,边把陆铿拉上汽车,直开黄埔路的“官
邸”。蒋介石见了陆铿第一句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你
说!”

陆铿说:“能不能让我多说两句?”

老蒋很不耐烦,但也没说“不可”。于是陆铿就将自己

见到的国民党多种腐败现象脱口而出,特别把他在豫北采访王仲廉部的亲身感受,详细细细地和盘尽托。他说前方士兵艰苦作战时想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因为国家没钱给他们买水壶,而后方的官僚们却穷奢极侈,国人的怨恨都集中在孔祥熙、宋子文身上。《中央日报》揭露孔、宋等中央大员,正表示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说了一些“捧场”的话。

陆铿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最后要求蒋介石给予处分,李惟果马上站起来说:“报告总裁,惟果负责宣传部,

有负总裁嘱托之重,请求给惟果处分。”蒋介石脸上的怒气全消了。他也跟着站了起来竟连着说:“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

于是,这场闹剧就此关门拉倒。

事后,陆铿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处获悉:原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跟蒋介石谈话时,无意中谈到这件事,竟赞扬这是“民主的表现”。老蒋听了就更加不了了之了,并以此说服了宋美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一书记述了彭德怀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坎坷多舛的命运和他的高尚品格坚贞气节,是一部以全新的视角研究和描写彭德怀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材料来自彭德怀一手抚养成人的七个侄儿侄女、熟悉彭总的老将军、老干部,有极高的可信度。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蒋介石日记揭密》一直以来,蒋介石日记被列为与公众无缘的密档。该书辑录了蒋介石自1915年——1949年逐年的日记1000余则,内容主要涉及军事、政治、党务、外交以及游治、家事等活动,是人们平素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该书的出版,可以使我们尽量置身于那个时代,从更多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了解蒋介石的真实面目。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梁漱溟全集(精装八卷本)	梁漱溟	498.00	20.00
蒋介石日记揭密(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究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 鹰	26.00	6.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西北军演义(上下)	骏 声	68.00	8.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39.80	7.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风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6.00
渔光曲——安娥作词歌曲集	钟立民	18.00	5.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北平《解放》报往事

● 孟中洋



解放报社徽章

1946年2月，在北平诞生了一份名为《解放》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我党、我军在平津地区及华北、华中国民党统治区惟一公开发行的报纸，由于仅存三个月就被国民党查封，多年来在中共党史和新闻史上多被忽视而少有关注。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到了这份报纸的一件证物，并有幸走近当年办报的于光远、孙政老人，聆听他们叙述那段艰苦光荣又惊心动魄的往事。

一枚证章引发笔者追寻历史

笔者业余有收集各类早期徽章的爱好，并以此为引子，学习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这其中就有

一枚北平《解放》报证章。这是一枚外型不起眼的蓝白红相间铜质景泰蓝证章，证章的上方排列着威妥玛拼音“GIE FANG BAO SHE”（意即解放报社），中上部为红五星，中间横排“解放报社”四个红字，下面还有“北平”两字。

在得知这枚证章背后蕴藏的光辉历史后，不由萌生了以此为契机追寻那段往事的念头。但在随后查阅《解放》报史料时，却发现这段历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上受条件限制，能看到的资料寥若晨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于光远是当年该报五个编委中惟一的在世者，便极想拜见这位重要的见证人。2006年暮夏，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和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的引荐下，在《解放》创刊60周年之际，终于走近了于光远老人。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根据三方协议，军调部的命令、协议、公报等须由三方的新闻机构——国民党方面的中央社、中共方面的新华社和美方的美国新闻处发表。据此，在新华社北平分社成立的同时，一份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中央机关报《解放》，经党中央批准于1946年2月在北平诞生了。该报的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的喉舌，和各界同胞共同勉励，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事业。初定三日刊，后改为二日刊。

而最早受党派遣到北平办报的人便是于光远等同志。

“解放区的新鲜空气”

首次见到于光远,是在北京医院。他因病正在住院治疗。韩钢教授后来告诉我,会面本来是定在出院后的,听说是为《解放》报的事而来,于老同意就在医院见我。由此可见这段往事在于老心目中的分量。

话题从证章谈起。于光远回忆说,当时北平还不是解放区,因此,北平一般居民都有想看看共产党人是些怎样的人的心理,我们报社和新华分社的工作人员走在大街上和坐在电车里是很出风头的。因为我们佩戴着“共产党员的标志”,即在胸前别着共产党的报纸或新华分社的徽章。在公共场所或者进行采访时,它是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惟一证件。

于光远深情地回忆起自己佩戴《解放》报证章的情形。“我经常把它佩戴在胸前,走在街上经常有人用一种友好和钦佩的眼光看着我”;在电车里,我常看见乘客中有人以极大的兴趣盯着我佩戴的徽章。有两次那个看我徽章的人似乎是近视眼,嫌看不清楚,就凑近我的胸前来看。我就让他们瞧个够,或者把徽章上的字念给他们听。有时干脆告诉他们,我所在的解放报社是个怎样的工作单位,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报社的宗旨和基本方针。”

北平《解放》报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和晋察冀中央局的通知,1946年1月4日,于光远来到北平,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所在的北京饭店见到了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告诉于光远: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南京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全国性政治中心。我们党在南京要做许多工作,党办的《新华日报》也要从重庆搬到南京。同时,日本投降后我们党中央也不能一直待在延安,也要搬出来。党中央很可能要搬到北平来,北平虽然同延安不一样,不是解放区,我们也不能把国民党的势力统统赶出去,但是城外四周围都是解放区,城里我们党的力量现在就很强,党中央搬来后,我们在北平就会占绝对优势。北平就会成为我们党为主的另一个全国政治中心。那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就会搬到北平来编辑发行。你们来办这

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来办做准备的。于光远说,当时中央有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中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和平,不再发生内战。当然我们也一刻没有放松战争的准备,一直强调要以斗争去争取和平。党中央在北平创办这样一张报纸,意义的确十分重大。

这以后,于光远便利用自己在北平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购买印刷用纸、联系印刷厂和选定报社社址等大量准备工作。随后,报社的其他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陆续抵达北平,成立了报纸的编委会,由五人组成。钱俊瑞任报社总编、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姜君辰任副总编,杨赓任采编部主任,郑季翘任编辑部主任,于光远任研究室主任。报社设有编辑部、采编部、研究室、新华社北平分社办公室、营业部、经理部、电讯组等,最多时达到80多人。

《解放》报创刊以后,很快成为北平家喻户晓的出版物,影响一天一天地扩大。于光远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天报社来了三个青年,但他们不进屋,就站在院子里,并说:“其实我们没什么事,就是想到解放区看看。”报社的同志一时没听懂。他们说:“就是这儿!解放报社就是解放区。我们就是想来呼吸一下解放区的新鲜空气!”说完这三个青年就在院子里做深呼吸动作。说到这里,于光远老人从病榻上欠起身,也反复做着深呼吸的动作。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

“四三事件”与“七七事件”

《解放》报一上北平街头,便被抢购一空,临时加印3000份也很快售完,被读者誉为“当代春秋,醒世金铎,读者之导师,社会之明灯”(读者来信),真正“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里最明亮的和平民主灯塔之一”(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论北平解放报事件并警告反动派》,1946年5月31日)。但《解放》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惊呼:《解放》报在北平相当于共产党在城里驻扎了一个师的兵力。据于光远说,报纸创刊后,就不断收到特务的恐吓信,说要来放火烧房子,丢手榴弹,并且发生了多次特务殴打报童和撕毁报纸的事件。

在多次骚扰和恐吓未奏效后,国民党当局终

于撕下面具。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许,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团和警察局突然出动200余名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了《解放》报社所在地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以搜查违禁品为借口,闯入办公室、寝室翻箱倒柜。随后,百余名武装军警闯入报社,以“户口登记未竣”为名,强行将总编辑钱俊瑞及副总编等29人抓走,带到警察局外二分局。与此同时,在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临时发行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军事顾问滕代远住址也遭搜查,军警强行逮捕人员达41人。

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召开军调部工作人员会议,商量斗争策略。当天上午,滕代远奉叶剑英之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了“四三事件”真相。叶剑英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向他们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指出:“‘四三事件’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有人指使的恶劣行为。”严正要求北平当局立即惩办肇事者,向我方公开道歉,保证我方人员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

北平发生“四三事件”的消息也很快传遍全国。战斗在国统区的周恩来、董必武等,驻渝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一百多个新闻单位,纷纷发出通电,声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斗争,抗议国民党北平军政当局的丑恶行径。

在事实面前,熊斌只好承认不该发生这一事件,口头保证以后不再歧视中共人员,并交待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向被捕人员道歉。4月4日下午6时,国民党当局被迫将全体被捕人员释放。

于光远回忆说,当时五个编委,被捕去了四个,只有他一个人未被抓走。因此,报社留下的同志下决心照常出报,于光远亲自写了《特务现形记——四三事件中的一个片断》,并在走访附近居民后,写了题为《特务行凶、居民受惊,本社人员分访慰问》的新闻报道。钱俊瑞在狱中还写了一篇《我们被捕了》的抗议文章。这些文章均及时刊发在《解放》或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当回忆起胜利归来的情形时,于光远提到,李克农同志专门打电话给他,让他准备了鞭炮。



军事调处执行部证章

被捕的同志乘坐军调部执行部准备的三辆卡车归来,都把事先准备的红布横幅展开,并点燃鞭炮,沿路高呼:“反对非法逮捕!”“正义胜利!”“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于光远激动地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喊“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可能是第一次,或者也是惟一的一次。

“四三事件”后,《解放》报声誉大振。报纸的发行量由1万份猛增到5万份以上,成为当时北平各报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于光远说,有个对比,当时国民党办的《华北日报》,发行量连赠送和摊派在内也不过8000份。

但国民党当局对《解放》报的压制和破坏并未收敛。1946年5月29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通知报社,他们刚刚接到延安的电报,说蒋介石决定今天晚上查封《解放》报,指示对这次查封不能再硬斗,而要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第二天一早,报社的同志发现查封的布告果然贴到了大门口,理由是“近查本市许多报纸、杂志、通讯社竟未遵照规定,一面呈请登记,一面印刷发行,甚至有言论荒谬者,殊属不合,奉中央严令取缔,勒令停刊”。

据于光远回忆,当天夜里,大家等待着这件事的到来,结果一夜平静,看来,经过“四三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惊动我们,怕惹出麻烦,半夜偷偷贴完就走了。北平当时还有75家进步新闻出版单位,连同《解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正好是

77家。因此,叶剑英把这件事称为“七七事件”,说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空前的大反动”。

《解放》报自创刊到被查封,仅存了三个月的时间。事发后,《解放日报》随即刊发了社论,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抗议。报社的同志自然也是义愤填膺。为此,叶剑英同志专门召集报社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讲话,指出:“国民党政府查封《解放》报与新华分社,是因为你们替老百姓说话。群众拥护和平,反对内战,拥护民主,反对独裁,你们敢于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敢于宣传真理,主持正义,敢于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的、反动的丑恶面目及其法西斯反革命罪行。”我们几个月在北平的奋斗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相信要不了很久会重返这个古都,那时候,这个城市将是我们的天下。”于光远说,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话,热烈鼓掌。

孙政的故事

拜访孙政老先生,是于光远引荐的。于老告诉笔者,当时《解放》报除了从外地调来的人员外,不能没有熟悉北平情况的人。北平的孙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报社的,他也是非常熟悉《解放》报历史的一位老同志。

循着这个线索,我在北京找到了位于外交部街的孙政老人寓所。孙老已78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提起《解放》报社,孙政非常感慨。他说,当时办报非常艰苦、危险,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非常光荣和自豪。据孙政讲,他经党组织介绍进《解放》报社,同他谈话的报社负责人便是于光远,地点在位于西长安街的孟用潜等同志创办的中外出版社。他经历了报社从创刊到被查封的全过程。当时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合署办公,报社被查封、人员撤往解放区后,根据组织安排,孙政继续留在军调部新闻处,编发新华分社的《新闻稿》,一直到1947年春撤返延安。

孙政老记忆力好得惊人,对报纸往事娓娓道来,事情细节记忆犹新。回忆起《解放》报创刊的情景,孙政非常激动。他说,大约是1946年2月19日夜,我和祖田工同志在长城印刷厂校核创刊号清样,到深夜,四块活字版终于改清并签

字付印了。于是我便在西直门门脸处叫了辆三轮车,将四块八开的活字版送往立华印刷厂印刷。三轮车在寒风中颠簸着,当时真担心有特务窜出来将字盘掀翻。承印《解放》的立华印刷厂是我党的地下印刷厂,设备非常简陋,印刷创刊号时还没有电力,印刷机主要靠工人们双手摇动那带有把手的巨大惯性铸铁轮运转。就是在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印刷出来的《解放》报,竟使许多家先进转轮机印出来的国民党大报黯然失色。

孙政是“四三事件”中被捕的41名同志之一,他回忆道:当时在国民党警察外二分局中,我们几十人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钱俊瑞问我:“小孙,你觉得怎样?怕不怕?”我说:“他们没道理,他们很被动,我不怕。”夜间,我们分批值班,轮流休息。当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李聚奎、荣高棠等同志到外二分局慰问我们时,一直不停向警察呵斥的杨赓同志手举着点心向大家笑着说:“你们看,杨赓吃羊羹啦!”逗得大家大笑。这真是战斗的集体、乐观的集体。孙政还告诉笔者,斗争胜利后,大家分乘卡车,在归途中一路上燃放鞭炮、高呼口号,同夹道的市民一起欢庆。国民党当局恐慌异常,竟派特务骑自行车紧追,并用水桶向车上泼水,企图将鞭炮浇湿,但终归是徒劳而已。

有资料说,北平《解放》报是中央晋察冀分局主办的。这份报纸到底是中央机关报,还是地方报纸?孙政认为,从报纸的筹备情况看,应该是党中央的报纸,这份报纸实质上是为延安的《解放日报》打前站的。从前期筹划看,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亲自部署、具体组织安排,确定的报社人员中,社长为徐特立,总编辑钱俊瑞时任新四军的秘书长,人员都是从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因此把这份报纸看作地方性报纸是不确切的。

目前反映《解放》报史实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29日报社被查封后,叶剑英等人站在报社门口手指查封布告的一幅照片。这幅照片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书“北平解放日报社”。这似乎与已出版的《解放》报名称有异。于光远提到,当时李克农找他谈话时,明确说报纸的名称就叫《解放日报》。但后来限于条件,只能先出三日刊和二日刊。对这张照片,孙政回忆说,其实在被查封前,报社的木牌已经做好了,因为当时已决定于6月

1日改出日报。因此,拍照时,就搬出了预先准备好的这块牌子。于光远在谈到此事时也说,他们选定这个日子也有讲究,这时候我们出日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块制作好的招牌,只等出日报那天往大门口挂了。有可能特务机关已经探听到了消息,抢在我们之前动手。从两位老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对《解放》报的确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对于笔者手头的北平《解放》报社证章,孙政辨认后给予了证实。得知笔者收藏的这枚证章出自大连,孙政回忆说,《解放》报人员撤返到东北、后来辗转到大连的只有刘稚农同志一人,极有可能是证章的主人。他告诉笔者,证章是当时在报社任美编、后成为美术大师的蔡若虹设计的。蔡若虹来报社之前,美编工作是由孙政兼任的,蔡若虹设计这枚证章的时候,孙政在身边目睹了整个过程。孙政还提及,十几年前,驻京的在《解放》报和北平新华分社工作过的老同志聚会座谈过一次,当时一位同志还带来了这样的证章,但不久这位同志就故去了,我们曾派人到他家中征集过,但终究没有找到。据笔者所知,刘稚农几年前也已驾鹤西去,这枚证章的主人可能已无从查找,惟有证章承载的历史厚重将永远给我们以激励和鼓舞!

“墙上历史教科书”

“墙上历史教科书”是于光远的提法,通俗地说,就是在有历史意义的故居、旧址或原址的墙上钉上标志牌,让后人纪念和记住。

《解放》报共有两处社址,即北平西四的三道栅栏41号和宣武门外的方壶斋9号。于光远说,起初报社是没有地址的,他在北平时曾做过努力,李克农也表示这件事是应该办的;“你可以努力去办,几千块钱我们党组织是可以出的”。但直



本文作者(右)探望于光远

到1946年2月中旬,时任张家口法院院长的阮慕韩将其三道栅栏41号的私宅交报社使用,《解放》报才算有了固定的“家”。

于光远说,三道栅栏41号自30年代起就是北平地下党的活动地点,《解放》最早两期就是在这里编辑的,但这所房子面积不大、不够用,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又从一银行家杨寿枢手中用3000银元购得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三道栅栏则继续作为报社的发行部。

对《解放》报的这两处地址,当年报社的老人们有着浓厚的感情。1994年3月24日,于光远和孙政专门重访过这两个地方,但见到的已面目全非,三道栅栏住了三户人家,方壶斋原报社大门也修成了公共厕所。于光远非常感慨。他曾多次说过,《解放》报存世时间短,对这段史实,知者不多,甚至中共党史和新闻史上也少有提及。他希望能在这两处原址最近的建筑物或墙上钉一块铜牌,作为“墙上历史教科书”的一页,让后人知道。

提起这两处旧址,孙政也嗟叹不已。访问这两处地址时,孙政专门拍了纪念照片。方壶斋胡同过去报社院子前面的道路,已被一座大型商厦的地基占据了大半,以至于拍照时,照不了全貌,只能站在地基边,再后退就会掉到深沟里。

于光远常说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孙政老人告诉笔者,十五年前,他去看望于光远,于光远提出回忆总结这段历史,决定成立由张沛、扬子江、韦韬、孙政组成的“北平《解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史料编写组”,并推动召开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座谈会,把这段几乎湮没无传的光辉斗争史整理出来。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会议所需的费用和开会的场地,年事已高的孙政四处奔走联系,才得以解决。由二十余名老同志和一些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得以圆满实现。会后,在孙政的积极奔走和热心参与下,新华总社的内部刊物《新闻业务》出版了“纪念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创建四十周年”专辑,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北平解放报始末》一书,总算为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看到了这样一则令人欣慰的消息:中国青基会西四宿舍旁设立了铜牌,上书:“南玉胡同一号(原三道栅栏41号)北平地下党解放三日刊遗址,阮宅二零零六年清明节立”。据悉,该院落还设立了介绍板,全文如下:

(上接18页) 可见陈独秀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虽然还没有触及经济体制,但已触及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而且追溯到十月革命。其深度与广度振聋发聩!苏联解体,从1996年起,叶利钦下令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睦和解日”。就在2004年的“和睦和解日”过后不久,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案,以“意识形态根据已经过时”为由废除了两个“不工作的节日”,即12月12日(苏联时期的“宪法日”)和11月7日。这引起了俄共等左翼政党和某些民众的强烈反对。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荡和凝聚民众,俄罗斯国家杜马2005年6月份又通过联邦法律,做出了两项规定。第一,将每年的11月4日定为国家节日,取名为“民族团结日”;第二,将每年的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恢复在红场举行

“北京市西城区南玉胡同一号(原三道栅栏41号)是地下党员阮慕韩同志的宅院。从1934年至1946年的十年内,这里一直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并且从未被敌伪破获过。三十年代在这里活动过的早期著名革命家有:王世英、张友渔、杨秀峰、阮慕韩、南汉宸、孙文淑、张申府、刘清扬、邢西萍、何松亭、钱应麟、温健公、黄松林、阮务德、庄金林……等同志。

1935年至1937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这里是抗日救亡爱国活动的重要联络点之一。许多热血青年、爱国志士经过这里投奔解放区,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也曾利用这里为掩护,向解放区抗日军民运送医药等物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我党中央决定用这所院子公开出版《解放三日刊》。该刊物的负责人周扬、于光远、孙敬文同志在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下,在这个小院子里艰苦奋斗,向当时的北平市民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应有的贡献。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小院被国民党查封。”

虽然这个铜牌和介绍板还不是出自政府之手,虽然上述介绍对《解放》的叙述还不尽准确,但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追寻那段艰苦卓绝的光荣历史,牢记前辈们作出的卓越贡献。老一辈们的心愿一定会实现。(责任编辑 李晨)

阅兵仪式。前者是为了纪念1612年11月4日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大公带领俄罗斯民兵击退占领莫斯科的波兰侵略者,恢复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地位;后者是为了纪念1941年11月7日受检阅的红军战士直接开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寇浴血奋战。十月革命的祖国早已经不纪念十月革命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也早已不再在11月7日举行游行和庆祝了。这件小事当能证明陈的先见之明。

陈独秀的上述文章,受到老友胡适的重视,予以刊布,高度评价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傅斯年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中国启蒙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陈独秀到了晚年,再一次对中国进行新的启蒙。(责任编辑 吴思)

许世友和他的三任妻子

• 王春华

记得儿时,曾听人们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许世友将军平日警惕性很高,时常提防有人谋害他。他不仅有飞檐走壁的神功,还有打枪百发百中的硬功夫。他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无论是谁,要是不喊报告进来,随手就是一枪。就这样,光老婆就打死好几个。多年后,笔者有幸到南京军区机关工作,接触了一些曾在许世友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才弄清,那传说纯属胡编乱造。将军曾经结过三次婚,三任妻子没有一个是被他用枪打死的。



(一)

结束了少林寺的杂役生涯,许世友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湖北省麻城县泗水店许家村(今属河南新县),投身到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担当起革命赋予他的第一职务——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见儿子长大成人,该成个家了,就四处托亲拜友张罗这事儿。不久,母亲为许世友物色了一位名叫朱锡明的邻村女子。锡明属虎,1901年出生,比许世友年长4岁,天生丽质,勤劳,本分,是村里的妇救会会员。许世友是个大孝子,又加上父亲早逝,就更加孝敬母亲。既然母亲看上了这姑娘,许世友也就谨遵母命依了娘。

1924年春天,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娘的操持下,许世友雇一顶花轿和几个吹鼓手,将朱锡明热热闹闹地娶回了家。婚后,小两口感情甚

笃,日子过得和谐美满。

可是,许世友与朱锡明仅度过三天如蜜的日子,就接到了作战命令。告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许世友率部投入了战斗。母亲和锡明在家做军鞋支前,有时还参加洗衣队上前线慰问。在那硝烟滚滚的峥嵘岁月里,锡明只能深更半夜偶尔与丈夫团聚。

朱锡明与许世友共生了三个男孩,乳名都叫“黑伢”,前两个都夭折了。生下第三个男孩,许世友仅见了一面,便迎着阵阵枪炮声,率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转入遥远的战场。此后,音讯杳无。

孩子长到3岁了,还没有名字,许母和朱锡明都在盼着许世友回家给取名哩。可是,一天天过去,始终等不来许世友的身影。后来,干脆也叫了“黑伢”。

兵荒马乱,战火纷飞。许母也不知道儿子是否还活在世上,听着孙子的喊叫,常常与锡明四目相对,无语凝咽。花落了又开,草枯了又荣,许世友依然杳无音信。果敢的许母终于咬了咬牙,自作主张为儿媳找了一位老实的庄稼人夏昌文。经人左劝右劝,朱锡明顺从了许母,留下黑伢跟奶奶苦度时日。

朱锡明改嫁后,没有再生孩子,有事没事常回到许母身边,与许母聊聊天,帮着做些家务。十几个春夏秋冬过去,黑伢长成了十几岁的小伙子。许母的头发全白了,她再也不盼儿子了,全当他死了。可就在这时,全国解放了,许世友的名字登在报纸上,他当了大官,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朱锡明得知许世友还活着,既高兴,又惆怅。高兴的是,自己深深思念的亲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上,惆怅的是自己已另有所属。而许世友在此之前因误听传言,以为锡明已死,已重新组成了家庭。原来,许世友出征不久,就听到传说,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疯狂报复,对苏区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母亲和小妹离家逃难,生死不明,妻子和儿子不幸身亡。兵荒马乱的年头,许世友重任在肩,也无法去核实传闻真假。其实,朱锡明并没有遇难,而是带着孩子同许母、许世友的妹妹一道,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一段时间里,为了照顾染病的许母,拉扯年幼的小妹和孩子,朱锡明每晚去乱坟场扒死人的衣服,回来做成鞋子和袜底卖,然后换点粮食,这才保住了一家的性命。

刚解放时,许世友接母亲到济南居住,母子二人在一起时,母亲常常向儿子讲起儿媳锡明如何如何好,如何孝顺,许世友听了,常常感叹不已。

(二)

如果说许世友的第一次婚姻是母亲包办的,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长征途中,许世友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一方面军中的众多革命伴侣并肩战斗的情景,对奉行禁欲主义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影响很大,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决定,军以上干部可以寻找革命伴侣成家。而早已战功赫赫的许世友当然身在此列。

长征结束,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对投奔延安的四川达县热血女青年雷明珍产生了好感。经人撮合,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很快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你敬我爱,相处如宾。雷明珍平日里好学上进,工作上大胆泼辣,对许世友体贴入微。许世友调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后,奉命征收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细心的雷明珍将羊毛收集起来,抓住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红色种子,许世友等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进入红军大学(1937年元月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雷明珍被中央组织部分到延安县负责妇女工作。两人虽不在一块,但感情更深。

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3月的一天,传来了

西路军失败的消息。许多在抗大的红四方面军学员悲痛万分,许世友心疼得两顿没有吃饭。西路军的失败,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点燃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导火索。有人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扯到了一起。许世友忿忿不平:“张国焘是张国焘,我们红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红军啊!”

“批张”斗争的扩大化,使许世友倍感委屈。数日后,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许世友竟萌发了要悄悄带老部队回四川打游击的奇想,并开始了秘密准备。此事被抗大保卫处长王建安知道后向上作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震动。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10余名高级将领被关。

这是许世友一生中第三次被囚禁。第一次是在吴佩孚部队,他一脚踹死了一个为非作歹的老兵痞子,被关进了北洋军阀的监狱;第二次是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一师当连长时,连里两名班长抢劫民财,他因管理不善受株连而被关进国民政府的铁窗内。而这一次,则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囚室。这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失去自由时间最长的一次。审讯结果,已是晚上10点多了,许世友回到囚室,正遇上来给他送行李的同班同学小张。

“谁让你送的?”许世友冷冷地问道。

“陈赓队长。”小张说。

“我原以为今晚要睡凉炕了,没想到还有人关心我。”落难之中的许世友心中涌起一股感激之情。

“我要走了,有事要我帮忙吗?”小张临离开囚室,问许世友。

“请给我老婆带个口信,叫她来一趟。”许世友停了停,又对小张说道,早春天气冷,让雷明珍来时顺便将那件毛衣带来。

当时许世友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对谁都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因此把一切看得很灰暗。落难之中,许世友更加思念自己的妻子。除了儿女之情,许世友更主要的是要向她陈述事实真相,寻求理解和安慰,并为不能陪她白头到老而当面道歉。

小张走后,许世友一天天地盼。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许世友还没有如愿见到日思夜想的爱妻。

忽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是她来了!”许世友凭直觉这样想,不由得从炕上坐起来。门开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上次来过的小张,而不是妻子雷明珍。许世友不由得一阵失望。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一条烟。”

许世友从小张手上接过烟,轻声问小张:“上次的口信捎到没有?”

“捎到了。”小张叹了口气,接着说:“雷明珍已升任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红大’,交给我一个包裹一封信,让我转给你。”说完,小张便把那封没有信封的信和包裹递给了许世友。

“信?”许世友以为雷明珍工作太忙,一时来不了,便托人捎信来安慰他。可是出乎他的意料:“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签字。”

打开包裹,再看那件曾给他带来无限幸福和温暖的毛衣,已是一包碎片。

许世友如五雷轰顶。在他最需要亲人理解和抚慰的时候,一封绝情信、一堆毛衣碎片,在许世友这位刚烈汉子的心灵上该留下了怎样的创伤!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批张”扩大化被纠正了,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兵打仗。雷明珍对自己一时的冲动追悔莫及。多次向许世友认错并希望复婚,可许世友就是不肯原谅她。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上太行山时,雷明珍也主动要求去抗日前线,一起到了太行山,陈赓、陈锡联曾将许世友与雷明珍反锁在一间屋里,希望他俩好好谈谈,沟通理解,可许世友破门而出,扬长而去。后来,许世友去了山东,并在那里续写了第三次姻缘。

(三)

1941年春,许世友率领清河军区独立团挺进胶东。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胶东的土地。在山东许世友整整战斗生活了十六年,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平生的最后一次婚姻,就是从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开始的。

许世友整天带兵打仗,生活却因无人照料越来越随便。后勤部长高大山私下里为他在根据地的工厂里物色了几位品貌皆优的姑娘。

高大山对许世友说了这事儿,许世友既不点

头也不摇头,骑上马跟着高大山就走。其实,许世友心底里是很感激这位部下的。

第一个目标是根据地的皮革厂。进门以后,许世友顺着高大山的手势看去,只见一位俊俏的姑娘正在那里干活,显得十分专注和认真。许世友对高大山说:“就是她吧!”这四个字,像是询问,又像是赞同,其实二者皆有。许世友“一见钟情”,说完策马而去。将军果断的个性,从这次相亲可窥一斑。

这位胶东姑娘名叫田明兰,后来改名为田普,家境贫寒。在部队,她先在胶东军区后勤工厂工作,后到五支队做支前工作。

1943年春天,许世友和田明兰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喜庆的鞭炮,没有亲友的祝贺,有的只是一包喜糖,一杯清茶,还有一帮生死之交的战友。

许世友和田明兰新婚燕尔没几天,就因军务繁忙而匆匆分手。许世友上前方打仗之前,精心安排了新婚妻子的工作。他让警卫员备马将田明兰送到了胶东党校,并亲笔给当时的校长聂凤智写了一封短信:“田明兰同志目前随你校行动,请安排她的学习和工作。”聂凤智对老首长许世友十分尊重,当然对他的夫人也关怀备至。不久,组织上正式给田明兰安排了工作,担任许世友的生活秘书。从此,大家都改口叫田明兰为“田秘书”,都知道是许司令夫人。

田普与许世友婚后相伴四十余年,生有6个子女。许世友生前曾感叹地说:“田普是我一生的忠实伴侣。”并声言来世还要做伴侣。许世友逝世后,田普在一篇文章里深情地回忆道:“正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们相识了,记得我第一次在胶东五旅见到你时对你还有些敬畏,但你那许多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却深深地激发了我,其后的几十年内,你成了我的严师诤友。”解放后,田普曾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等职,现在北京离职休养。

许世友逝世后,田普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我在红军十年》、《我在山东十六年》以及其它有关文章汇编成《许世友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她还组织了写作和摄制班子,以许世友童年为主线,拍摄了上下集电视剧《少年许世友》,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中 国 的 端 纳 ”

● 裴毅然

第一次与闻端纳是在读到‘西安事变’的记述中,只知这位老外居间调停,从南京到西安,与宋美龄同机飞往,忙里忙外,穿针引线,深得各方信任,对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有一份贡献。

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 Donald)乃澳大利亚人,1875年出生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小城里斯峪一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在印刷所当排字工,23岁起进入新闻界。1903年以悉尼《每日电讯报》记者身份赴远东采访,不久接受香港《德臣报》聘请出任副主笔,同时还兼任其他一些外国报纸通讯员。19世纪末正值维多利亚时代(1839-1901)后期,西方新闻界梦幻般的‘黄金时期’。掌握信息的记者与编辑,左右西方世界公众舆论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篇篇报道通讯犹如百发百中的‘魔弹’,完全左右公众舆论,握有操纵时代风云的手柄。新闻记者通过包罗万象的记叙,大胆充当决策权威,实现对‘荣誉与权势’的追求。依托这样的时代天幕,28岁的端纳踏上了中国。此时的他,生机勃勃,对民主事业怀抱信心,对积弱落后的中国充满同情与改造的渴望。

端纳参与中国政界的第一步便是成为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免费顾问,发动广州商民抵制日货,帮助张人骏摆脱日本人的高额讹诈。1904年1月,他根据自己搜集的情报,预言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旋得应验。端纳与袁世凯也有短期接触,多次向袁建议起用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治理国家,但遭拒绝。1908年,他在香港结识胡汉民、宋耀如等革命党人,成为他们的积极支持者。端纳敏锐意识到庞大中国对世界的意义:‘你将会知道这个最古老而人们又最不了解的国家,正在写着世界的头条新闻。只要这个巨人烦躁地翻来翻去,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舒服地睡觉。’

1911年春,端纳以《纽约先驱报》驻中国南方



端纳(1875—1946)

记者的身份抵沪,联系上伍廷芳等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后,端纳作为上海总部顾问,夜以继日地协助伍廷芳(不久出任外长)进行对外联络,参与筹建共和政府。同时,撰写大量现场报道,鼓吹革命。他还督促革命军攻打清廷在江南的最大堡垒——金陵,亲临前线予以报道。孙中山海外归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成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

此后,端纳一直活跃于民初中国政坛,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和张学良的政治顾问,193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史家有评,端纳不同于大多数西方来华冒险家,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始终抱有超越个人利益和国界的责任感,其执著度甚至超越宗教信仰。他在中国前后30余年,满怀热忱地帮助孙中山革命;一心一意为北洋政府制定改良政策,最早发现‘二十一条’密约,机智地将其公之于众,帮助张学良戒烟,促成东北易帜从而避免内

战,帮助中国政府抗战等等。或许他对政治抱有某种西方式野心,渴望一鸣惊人,但是他毕竟把个人建功立业的目标与改革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国家与民族局限的使命感,可否也能称为“国际主义精神”?

“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作为蒋介石夫妇的顾问,又与张、杨原本相熟,十分适合作为居间调停人。但是,主张向西安用兵的何应钦竭力阻挠端纳前往西安谈判,坚持蒋介石已死,毋须再与西安交涉。1936年12月13日中午,端纳受宋美龄及孔祥熙夫妇委托,秘密飞离南京,先飞洛阳,等待张学良方面的“准入”电讯,12月14日拂晓再飞西安。端纳奔波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数次往返南京与西安之间,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至少有一份参与性贡献。12月22日,他陪宋美龄专机飞西

安,下面就是正沿着铁路向西安方向运动的南京军队,宋美龄十分紧张,飞机滑停前,将一支左轮手枪塞给端纳,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端纳耐心地望着她:“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宋仍坚持:“请答应我吧。”有资料表明,还是端纳出主意让蒋宋接见周恩来,动用周恩来的影响,说服不同意释蒋的杨虎城等西安将领。

端纳政治上的成功与其外国记者身份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政治民主化呼声高涨,西方记者既对新型民主政治相当稔熟,又是利害关系相对超然的“局外人”,因此能给中国政坛一茬茬新人以信任感。同时,西方性格也使端纳“始终以一种不转弯抹角的直率来对付东方传统的迂回曲折。”端纳是幸运的,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找到了一块实验基地,并孵育出一份期盼中的收获。西方评论家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人像端纳为中国工作那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1940年,端纳因与蒋介石不和,辞职离华,驾艇环游太平洋,实现其儿时梦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蒋、宋急电端纳回华助战。端纳允诺,但战火使他的归华旅程极为困难。他在菲律宾登陆时,当地已为日军占领,所有欧洲人都被关押于集中营,尽管端

纳隐姓埋名,还是被人认出。当时,日军正以重金通缉这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然而,集中营里的难友无一人出卖他。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特殊要求,美国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空降兵占领了端纳所在集中营,端纳被美军直升机送往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可是,端纳此时因多年颠沛流离已病入膏肓,常在病榻上大口咯血。生命的最后时段,端纳十分思念中国。垂危时,宋美龄派飞机接他回上海医治,并在其弥留之际,立其床侧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他希望能长眠于中国,宋美龄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安葬了这位对中国有所贡献的澳大利亚人。作为对这位洋人的最高致敬,便是国人赠他一个绰号——“中国的端纳”。(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屋 2007 年第 3 期目录

书屋讲坛	对大学教授自主性的拷问 治“大学”若烹小鲜 大学“扩招”失败的尝试	仁之 何中华 李炜光
说长论短	本土建筑大师的焦虑 隐藏在中医争论中的真问题 也谈税收	刘心武 马湘一 程强
灯下随笔	哀诉之音的绝响 ——关于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水仙花的芳香	蔡禹僧 王士跃 王开扬
其人其事	笑谈易中天 寂寞一诗翁 ——重说柳亚子	黄波 黄永玉 张家清
书屋品茗	晨钟暮鼓八十年 《冯道传》与新旧《五代史》的命运 浦江清日记中的吴宓先生 邓拓创造的杂文辉煌 至性至情有几人	范超 于继增 王开林 鸣弓
史海钩沉	“罪己诏”:帝王的自我批评文本 皇帝的制度靠不住 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三)	风振衣 冉云飞 余凤高
科文经纬	《莎乐美》:伦敦的禁演	韩士奇
来稿摘登	现代文人的自创字 “扰民”居然是新词 孔夫子何需洋人撑腰	采诗 车光明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h5314@263.net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言

● 李锐

2005年年底,收到一位老同事寄来的《综合哲学随笔》,他同作者高亮之是浙江大学的同学。读后使我大开眼界,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首先想到的是,我1990年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那篇八万字的长文中,曾对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作过探讨。剖析过他的“斗争哲学”思想。“动”与“斗”是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认为差异就是矛盾,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从而形成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世界事物无处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行吗”。当年在“斗争哲学”思潮的统治下,不仅从历次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也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我写这篇长文时,深深感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干扰太过分、太可怕了,这颗苦果对当代中国造成多么惨痛的悲剧。

由于自己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关于哲学问题也就到此为止,不能进一步了解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的发展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即人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人的本质;以及有关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些根本问题,如唯物论同唯心论的对立,什么是辩证法等等,自己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此书作者以“综合”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很有新意,敢于对传统哲学观点挑战,敢于创新,使我十分钦佩。

读了这本书后,同作者取得联系,承蒙他寄赠我十本,使我于2006年1月26日,得以分别给中央六位领导同志寄出,并附上一封信,全文如下:

此书值得一读,特寄上。作者是老干部,自然科学家,原江苏农科院院长,在农业气象等方面有过卓越贡献。他主要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来理解哲学问题,研读过古今中外哲学名著(书中摘引书目上百种),感到我们党过去的成功与失败都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与错误及其理解分不开。受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作者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形成以“综合”为核心的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都以丰富的实例加以说明。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合理部分,扬弃一些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观点(如“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等);认为我们过去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采取排斥态度是不对的;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近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思想,包括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思想,都来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同孔子的“和而不同”分不开。作者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部分综合起来,构成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

去年我曾推荐过建筑学家张钦楠老年写的《读史札记》。我深深感到,不熟知自然科学,也难弄通社会科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普世规律,我们信仰的主义和理论,以及党本身的经历和怎样执政,都应有全面的反思。

我去年进八十八岁,为自己做了一首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信中特别提到自然科学问题,我确实感到我们这个党被禁锢在这种“斗争哲学”一言堂的误导中太久了,我们太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界的规律了。这使我想起过去的一件旧事。上世纪50年代,我从事水电建设工作时,就深深感到缺乏科学知识是我们这个以老干部为基础的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55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三千字长的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是报社让我写的。文中提到工业系统中四分之三的老干部自然科学水平只相当于初中以下的程度。“有的同志认为他们是管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有了一些应用的业务知识就够了,不必学习自然科学。这些同志不了解,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是根本分不开的,没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掌握科学,必须懂得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规律。不论工业或农业,不论基建或生产,都是同自然界打交道的,如果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进行政治领导和组织管理是会发生困难的。”从随后发生的大跃进运动来看,这篇社论可说是一篇空谈了。

作者是有卓越贡献的农业气象专家,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他从江苏农科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潜心研究哲学,读了上百部古今中外的哲学名著,他发现,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哲学都有合理

的部分,它们之间并非是互相排斥的关系,甚至可以有机的结合。他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在当代中国,应促进“中、西、马”哲学的大综合。唐、宋两代,曾有过“儒、释、道”的大综合,推动了中国的辉煌文化。“中、西、马”的大综合,应该能推动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振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吸收西方哲学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积极因素。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的,人民生活也有改善。但是国家的状况并不都如人意,社会上贫富悬殊问题突出,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人民还不能真正当家作主,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还受到种种限制。在国际上,强权主义与恐怖主义都带来世界的不安宁。在这样形势下,需要怎样的哲学思想来进行引导呢?虽然,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已同马列主义并列而提,体现了对于传统的马列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扬弃和修正。但是,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遗产,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对于在西方文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哲学,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科学同哲学的关系,辩证法问题,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人怎样认识世界和人的本质问题,等等,过去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才有助于我们建立推动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指导思想呢?所有这些问题,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作者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以“综合”为核心,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作者在“自序”中谦虚地说:“我只是希望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一些思考,在理论上探讨一些问题,以有助于国家各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即我们现在习惯的指导思想,仍称为“马列主义”,这是一种误导。这一概念原于斯大林的说法:“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首先获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无产阶级是由布尔塞维克共产党来领导的。”“我们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下转73页)

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

• 戴 煌

(一)

2004年春天,巫宁坤先生偕其老伴李怡楷女士应邀回国,参加燕京大学校庆。我和他素昧平生,只有过文字之交。当时,他们住在南四环中段一亲戚家里,巫先生给我来了电话,想和我晤面,并去拜访李锐老。当时已近米寿但一向为人谦逊的李锐老,说什么也要和我一道去南四环会见巫先生,绝不能让他费力劳神。

4月24日午后,我们来到南四环中段一居民区的一座楼房里,会见了巫先生和他的老伴。我们几乎畅谈了一个下午。到夕阳西下时,我们只得告辞。他把我们送到楼下,分手时还分别送我们一人一本他所著的一本书,名叫《一滴泪》。

(二)

有了这本书,才知道他第一次应邀回国是在1951年。在这之前,他的履历很简单: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两年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决心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他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三)

1952年11月份,他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轮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30来岁的教授。在一次课间,他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而决定文艺作品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之后,还勤奋翻译《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是他那时的译作。

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讨论时,人人都得在发言中暴露思想实际,沉默是不允许的。

除此而外,晚上全校老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朗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人人得做笔记,期终还得考试。这弄得很多人显得十分无聊,不停地抽烟,或者打瞌睡。有一次,他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他思想落后。

1954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大约有20多名的英、俄语老师开他的批判会。有人指出他所说的“洗脑”,是美帝捏造的反动谰言。有人揭露他在斯大林逝世时非常勉强地参加了悼念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还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个人英雄主义。

1955年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积极分子们争着发言,大喊大叫,声势汹汹,把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



1993年3月,作者于曼彻斯特学院演讲

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而被人抬走。

他刚到家,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翻箱倒柜地搜查这个家,把东西扔得满地。还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等。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临走时,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全部带走。

这时,巫宁坤除了深感受到了侮辱伤害外,更悔恨自己不懂得“谨小慎微”。同时他想起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在这期间,他听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了。接着他又听说南开还有其他人

自杀。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但是,由于自杀事件不是一个两个;“运动”马上降温。当又一次盘问巫宁坤在美国的经历、并怀疑他的爱国主义时,他开始愤怒地反抗了。他说他的一生是敞开的书。

他被软禁在家时,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的小说《巴尔姆修道院》,他就着手翻译起来。他觉得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他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1956年春天,出乎他的意料,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周恩来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使巫宁坤顿感高兴。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开的一位干部向他道歉,并向他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这使巫宁坤更加深了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信念。

5月中,学校人事处通知他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他们夫妇带着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

(四)

7月中,巫宁坤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也包括钱钟书等人,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有一次,巫宁坤翻译一篇发言稿,感到原文辞不达意,就脱口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翻啊?”素来以言辞锋利而闻名的钱钟书,这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接着又把一根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这使巫宁坤感到自己太天真而忘乎所以。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他被邀参加观礼。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他不理解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像对皇上一

样山呼万岁。

返校任教后,他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他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在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他忙里抽闲地供应几家重要学术刊物的约稿。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的批评出现不少“毒草”,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的人们,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这之前,校党委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大伙的发言冷冷清清。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言之凿凿地保证:党中央强调了这次整风必须“和风细雨”,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动员巫宁坤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他表示对教职员鸣放会很不满意,提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他认为大学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以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书老刘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在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重点谈到“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地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向我们道个歉吧?“继而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并发挥为“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的高度。从而他说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样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

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他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这席发言满意,后来有的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9月1号开学却并不上课,是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运动”。在揪斗“右派学生”后,也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学校的毛校长(女)抽着一支支香烟对他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咸得发苦的腌萝卜。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

1960年10月26日,这些“劳教”的“右派”,由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师“右派”,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儿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也有死亡。巫宁坤的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

位兄长从天津“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但他仍然浮肿和肌肠辘辘。就这样,还要出工强劳动。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来高价买来的一包烙饼,同房中的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原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的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待快到眼前时,他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吓得全身战栗:原来是老刘!他含着泪,埋好老刘后,赶车的要他们“搭顺风车”回,他们三个人一个也不肯上车,宁愿自己走回去。

这件事,使他十分感伤。他想到,老刘上大学时是个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他居然那样摔手而去,下一个就不会轮到巫宁坤!在抛去了重重顾虑,向李怡楷发出了“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五)

确实,李怡楷是个极忠实的伴侣。1952年冬天,燕京大学撤销后,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时,李怡楷还是南开英语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人称“假小子”,自行车骑得很快,冬天还爱溜冰,还是女排健将。由于巫老师讲课特别好,她有时和别的同学一起到巫老师家串门,也顺便说说自己学习的心得和问题。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这使巫宁坤打开

了人生新的一页。

1954年7月一放假,他们就在7月8日成婚。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的话,而且不给怡楷分配工作。他们就依靠巫宁坤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1956年夏初,巫宁坤被调回北京那所学校任教,李怡楷才被分配到英语系资料室管理英文报刊。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李怡楷一度险乎被迫放弃公职,后又把她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

现在巫宁坤面临生死,她好不容易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农场探监,亲眼看看三年没见面的现在又面临绝境的爱人。她先后两次带着三年没见过爸爸的儿子一丁和出生后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一毛,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车站下车,来回轮换着背着孩子和高价购买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单程18里、来回36里的石子路,与气势衰弱的巫宁坤见了三次面。在那里,她碰到了一个小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爱人收尸。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靠打零工养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哪有能力到黑市购买高价食品支援丈夫。她的遭遇使李怡楷泪流满面。她宁可冒着超假的危险,也要把巫宁坤救出苦海。

她为此决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虽然于副校长借口他们夫妻二人已与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再三推托,但她反复陈情,终于说服了于副校长。他最后说:“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让校党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医……”

(六)

1961年6月29日午后不久,巫宁坤正和几百名劳教分子和劳改犯在抢收小麦,忽然值日队长通知他去和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在一个树荫下,这个中年男子向他宣布:“农场领导让你回家保外就医。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吗?”保外就要好好表现,明白吗?”

这样,巫宁坤赶快打起行囊,先到天津拜见了老岳母和李怡楷的哥哥姐姐们,然后直奔合

肥。1962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鼓起勇气向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

不久,系里就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当临时工,每月工资60元。这虽然不及他当教授时工资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满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让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8月初,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怡楷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的爱人巫宁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于巫宁坤恢复公职一事,因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毫无结果,只给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60元涨到70元。

1965年,一些著名的影片,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年底,全国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安徽大学文科楼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把他画成“笑面虎”的漫画,说他是“死老虎没死”。接着他就被学生们揪斗。还有他班上的一群学生在夜间冲进了他的家,叫嚷“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把他拉下床,拖到楼下门口与外语系几位直挺挺跪在门前小道上的教授一起,被“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搽,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从此,作为“牛鬼”被关押在“牛棚”,离他“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他的七十多岁久患糖尿病的老继母也被诬称为“地主婆”,被轰回扬州老家,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临时工”工资也由70元减为30元。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对“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斗争和严管更加升级,并强迫他们从事重劳动。同时,还逼着他们写出了这样的“认罪书”——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



1986年春,作者夫妇于剑桥大学

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

1968年11月,安徽大学师生员工三千人,包括老弱病残和“牛鬼”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一连走了好几天,每晚途中宿营时,“牛棚”的人还得组织学习“四个伟大”或进行批斗。吃饭时,人人都得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请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到毛主席像前“汇报”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一些已经解除专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是工宣队的眼中钉,成了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李怡楷首当其冲地被“下放”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她只有一间半堆满了犁、耙、大粪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无光的茅屋,蚊蝇扑面,充满了尿臊、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临时工”待遇也被“下放”到这个生产队。虽然全家团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资过活。他们熬过了几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七)

1980年2月29日,他和李怡楷带着正读高三的三儿子巫一村启程回京。一丁和一毛留在安徽读高等院校。路过南京,他特别拜访了他过去读中学时的历史和国文老师羊达之。这时,羊老师已是南京师院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他在一张宣纸上给巫宁坤书写了宋词人陈与义的《临江仙》,因为词人劫后余生,故国重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在畅叙别后四十年时,巫宁坤曾很有兴味地谈到了这首词:

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3月2日,他们才到达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颐和园不远,原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太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红砖楼。他一进校就听说“文革”期间有一女生被批斗逼疯,从这楼顶上跳楼身亡。这又使他想到羊达之老师给他书写的《临江仙》: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他恢复教学后不久,即1980年10月,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定于12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他向学院陈院长请教可否参加。陈院长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冯教授大喜:“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这样,他很快就接到了一个特邀请帖。

12月,200多人聚会时,他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友,很是高兴。其中不乏“改正右派”。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

研究者作报告,题为《要文学,还是要革命?》等于重写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巫宁坤认为,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而且报告人又抬出日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流通。日丹诺夫何许人?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巫宁坤感到这太荒唐了。但他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个人。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最后主席介绍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讲话。这位处长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说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说罢哄堂大笑。接着,处长换了个严肃的语调说,他的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最后,他以权威的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说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好像还是赞成把全国引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引起巫宁坤的十分反感。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就意味着马上就宣布散会。散会的下一个节目就是告别宴会。巫宁坤觉得绝不可放弃这发言的最后机会。他争分夺秒地立即举手:“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尽管这有点出乎意外,主席也只好请巫宁坤发言。

他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还加了一句:“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的儿子一顿屁股。”这立刻也引起了哄堂大笑。接着,他谈到了现代派文学说:“这一点对有关的争论适用。全中国,甚至就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依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

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日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他走出会场时,有好些人和他握手,兴奋地说他“讲得好”。南京大学中文系“改正右派”张教授还拦住他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边说,激动得眼睛里含着泪水。

(八)

12月中旬,巫宁坤从成都回到北京,特地去看望了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卞之琳老师。一见面,卞老师就说:“听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他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的忘年交。他说:“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艺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巫宁坤笑呵呵地作了谢答。

同时,他又去拜访了沈从文老师。他记得1973年岁末,他在高庄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他惊喜交集。因为1958年被划入另册后,一直和沈老师断了联系。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仍是非常秀丽的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本人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巫宁坤曾把沈老师的来信一字一句地读给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子听,连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儿子一村都听哭了。

1980年回到北京之后,他曾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了沈从文老师。沈老师和师母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小四合院一间朝西的小屋,除放一张小床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比起五十年代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况愈下,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

回也不改其乐”。沈老师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一一从心上流过。”老师从未谈过个人的困苦。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他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沈老师竟潸然泪下。一是1973年,巫宁坤的大学同学萧珊,在上海经受多年的劳改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爱人巴金还关在“牛棚”里。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铮,在南开大学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说来,这种死难者太多了

(九)

在有了如此经历之后,1979年10月从芜湖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李政道备课很忙,和他匆匆晤谈了一番。临别时,他特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句话说,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国政府的国宾?

所以,他在这本书的“尾声”中说: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30年来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

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这本先用英文写的书,于1993年初在纽约初版,同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分别发行;稍后,被译成日、韩、瑞典文版,美国和英国所出的书还分精装本和平装本。多年来,众多亲友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敦促他撰写一个中文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迟迟未能应命。后来香港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远隔重洋,不辞辛劳,鼎力催促协助,他才得以弥补这一缺憾。

还该补充一句:1986年春,他在英国康桥大学作客,应主人之嘱,写过一篇自传性长文,题为《从半步桥到康桥》,发表于《康桥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简略地归纳过他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为了不辜负他的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他觉得至少可以把一家三代人在中国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不过这些苦难人的故事可以涵盖整个新中国的一长段的历史时期。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美、英、日、韩、瑞典、法国、哥伦比亚、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台湾的报刊,也有专文评价。在中国大陆,北京的《英语世界》独家转载了片段摘录,并发表了编者按,《读书》等书刊也有所评论。中外各家评论褒贬不一。无论是褒是贬,本书作者都认为受益匪浅。同时他认为,有人又祭起老祖宗“焚书坑儒”的法宝,那就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了,自然另当别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65页)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列宁的话中,即表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等于一党专政、领导专政、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也来源于列宁。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文中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的

恰恰是这段话。

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经济必须公正、平等、法治、避免垄断。我们的政治民主化也必须实施宪政,党和政府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一切依法而治。我希望《综合哲学随笔》这本书,不仅能澄清我们过去的若干错误指导思想,而且能推动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真正和谐的社会。

(2007年1月14日)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 韦 顺

一、风雨如晦听鸡鸣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他们说,迎春花代表社会主义,雄鸡两眼瞪着迎春花,就是仇视社会主义。在劫难逃,学院当然必须做批判的文章。一天,彭书记的秘书对我说,学院要召开批判陈教授的大会,书记邀我一同去听听,了解一下情况。

批判大会上,人人声嘶力竭地叫了一通。结束后,彭冲同志把学院党委书记找到一旁碰碰情况。学院书记见是单独向省委领导汇报,就说了心里话,大意是:“陈大羽同志是共产党员,工作很努力,教学有成绩,平时政治表现没问题,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错,这回没想到却因这事弄得……怎么说呢,彭书记,你看今天批得怎么样,以后还批吗?”我听着,觉得学校领导的这个汇报,既说了以往的实际情况,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情,又试探着领导的指示意图。听完汇报,彭书记说:“今天的批判会开得不错,大家情绪很高很热烈嘛。不过,人在工作中,总有这个错那个错,说错话、办错事都是难免的,我们看人不能只从一时一事看,要从一贯的表现看。陈大羽,我过去接触得不多,不太了解,你们一级党委这么介绍这么认为了,是可信的。我觉得今天批判他,是为了帮助,而不是要把人往死里整,至于以后这种会还要不要开,你们党委完全可以自己定(大意)。”在离开学校返回的路上,彭冲同志就对我说:“你看,批陈的大会是不是就算到此为止?你如果没有意见,我想托你晚上去看一下陈,防止他觉得自己没错,一时想不通做出什么意外的事情来,那就不仅毁了一位学者,也会牵出更大的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刚结合的省委书记,对一位“臭老九”正遇到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想着派人去打个招呼,安慰一下,这对当事人来说,是雪中送炭,井边救人,而对自己来讲,确是冒着生死荣辱的风险。这种正义的心态,令我感动。我表示愿意跑这个腿。

当天,我装着似乎无意地在校内打听到陈教授的住址,晚饭后去拜访他。也许是彼此从来不认识,同时他也无思想准备。我一进门,陈教授很惊奇,不知来意,无从启齿。我一看他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位老人在,也就放松了。我自报家门:“我是新华社记者,彭书记要我来看看你。”听到这句话,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来意,紧张的脸神转成了微笑的谢意。他请我坐下,马上转身去拿茶具,以他福建

家乡隆重礼客的工夫茶待我。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喝茶架势,一大把茶叶先放在小壶里,然后慢慢烧开,倒在酒杯一样大的茶杯里,一口一口慢慢品着喝,叫人感到很亲切。当时,外面的形势虽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室内的气氛却是轻松的。聊天中我把彭书记关心、爱护、希望和要他宽心、安心的话,既隐约又肯定地转述了。我们谈得很真诚、融洽、和谐。在这种氛围里,他不停地点头,也微笑着说些心里话:“作为共产党员,只要心地无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受点屈吃点亏,没啥,我谢谢领导。”几壶茶以后,陈教授带着感激和兴奋的心情要为我作幅画。我惊喜地表示感谢。他问:“你喜欢什么?”我冲口而出:“要大公鸡。”他一愣,以为我开玩笑(正在挨批的画怎么能画)。我又重复了一遍:“要大公鸡!”这时候,他忽地昂然一笑:“你真敢要,我就画!”于是但见他收拾茶具,磨墨展纸,兴冲冲似乎忘了白天挨批的事了。我站在桌边,看他从鸡冠落笔,先是从从容容,细描慢点,待画到尾部,他换粗笔,用浓墨狠劲上挑,一会儿,一只昂首凝目、挺胸翘尾的雄鸡,单爪立于舒枝展蕊、迎风怒放的红梅丛中的巨石上。画毕,教授郑重地掀章题赠,把画交到我的手里。我被教授的丹青妙笔、挥洒自如、须臾而成的画风感染,激动不已。我拿着画归来写下一首小诗:

傲然立石上 雄视遍寰中
风怒千岩瘦 寒梅偏放红

二、弭祸于未见胆识

1975年春,一位曾在省外事部门工作的熟人,偷偷地到单位来找我,神秘地对我说,他有个特急特密特重要的情况要反映。我当然郑重接待。他说,现在省委组织部中,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正在私下收集“党中央常委张春桥的黑材料”,此事非同小可,他说他已给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家信箱投了信,怕意外泄密,没讲内容,但要求立即接见,以便尽快查办上报。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说是一位在地质机关工作的熟人秘密告诉他的。我又问他找我有什么具体要求?他说:“你们是中央新闻单位,你还是特派记者吧?有责任迅速调查向中央反映吧?”我回答他,这事确实

不简单,我马上向领导汇报,给总社写情况内参,调查不调查,听总社指示。

就在当天下午,彭冲同志的老秘书丁永安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在福昌饭店见面聊聊。那时候,老丁我们三天两头见面,聊天是常事。晚上我应约前往,到了福昌,见一桌便饭已经摆好,骆平同志(彭冲夫人)、彭书记的前任秘书李勇也在座。几分钟后彭冲同志来了。吃饭间,老丁问我,今天有没有人找你反映情况?都谈了些什么?这时,我忽然明白,他今天约我一定是与我上午接待的来访有关。我就讲了上午接待熟人来访的情况。这时,我心里已明白,彭冲同志他们肯定已看到那封投书了,找我来,一是问我是否知道,二是想知道内容和我的态度。我汇报情况以后,也就顺便戳穿了这层纸说:“你们就是为了这事吧,要不然不会这样提问题吧?”彭冲同志听了我的话,只是看着我,没说话,气氛有点凝滞。聪明的老丁,看看彭书记一时不表态,马上站起来与彭小声耳语两句,然后对我说:“彭书记今晚还有个外事活动,得马上走,你多坐一会儿,我们聊。”于是彭冲同志也就站起身来笑笑,告辞先走了。

彭冲同志走了以后,老丁说,彭书记在政治上也是诚实稳健的;“文革”开始后,在省委书记处众多书记中,他受到的冲击最早,被批斗、游街的次数也最多,但他只讲自己的情况,从不牵连别人,不像有的省委领导,为了保自己,顺着批斗的要求讲。一年多来丁、李我们已相处得无话不说了,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彭书记对这件事的想法你们该知道一点,讲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老丁马上说:“彭的想法,我们还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这个问题的轻重,不敢轻易表态。我又说:“彭的想法暂时不管,你们看呢?你们是个什么想法?”老丁愣了一会儿,支支吾吾地说:“这事真假也不知道,查,从哪里着手呢?”这实际上又把皮球踢给了我。我立即坦诚地说:“你们认为要调查就调查,不要调查就不调查,先拖着。”我这个话实际上是表了态。他俩似乎听懂了,很高兴。所以老丁又说:“拖拖看,好是好,但投信的人说要彭书记立即接见,这事怎么办?”这时我想,他的话可能就是彭冲同志刚才耳语的意思。于是我就干脆说,如果彭书记真不想调查,我帮你们出个主意怎么样?他们觉得话越谈越投

机,便追问什么主意,而且要能天衣无缝,不留后患。我当时觉得事情已经谈到这个份上了,就同命运共呼吸吧。我说:我可以找投信人谈一次,告诉他,我已经和省委有关部门联系过了,现在群众给彭的信,每天都塞满一信箱子,信都编了号,按先来后到顺序接见,他多少号我不知道,等着就是了。我还可以告诉他,他反映的情况,我已及时向总社反映了,总社离中央近,反映快,有了说法我马上就告诉他,如果需要调查,我会马上和他联系。你们看这个办法行不行?他们一听,认为这个点子好极了,说这么跟他说,他就不好意思再急巴巴地催接见了。我们分手时,老李说,他们尽快向彭书记汇报,彭有了说法再谈。第二天,老丁就给我打了电话,他没说他怎么向彭冲同志汇报的,彭是怎么指示的,只是告诉我,就按我们商量的办。实际上,这就是彭冲同志对信访同志的答复。

时光到了1976年,周总理病逝后,全国马上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的大恶浪。社会上流传着所谓向“四人帮”的汇报信、检举信、效忠信、劝进信,弄得人心惶惶。同时,因为彭冲同志对批邓领导不积极,南京又传出江青对彭冲同志不满的话:“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这时候,对去年那封“鸡毛信”拖着不办的事,若透了风声,那后果真不堪设想。有一天,老丁对我说:“去年的事,千万不能被抖搂出来啊!”我说:“谁会抖搂出来呢?”他说怕投信的人现在乘机追起来:“为什么不接见,不查办?”我说:“那倒是个往上爬的好机会。”说实在的,那时候,好大一阵,大家真担心呐。好在几个月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说起来也好笑,“四人帮”倒台后,旧话真的重提了。省委着手调查起这件事了,当然目的完全不同了。调查组找了我,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

• 余明华

(一)

一次,彭德怀在与谢觉哉闲谈时说过这样一件事:陕北某县县志有一首描写地主生活的诗:“冷窑暖炕一盆火,稀稀咸菜泡蒸馍。”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就生产关系而论,地主居于剥削地位,但就生活水准而论,中国相当部分中小地主“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二)

彭德怀很少对人讲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但却对谢觉哉谈到其青年时代的几件事。彭说:“十五岁遇饥荒,里中办平糶(音 tiào,读四声,平糶即卖平价米之意),某财主不肯糶,候至午后,饥民大愤,我首登屋,用档扒下他屋瓦,众人都上,把正屋瓦都下了,我以为我很有理。我五叔是穷人,站在我这边,我堂伯是富人,说我没理,从此我才知

道世上的道理有两个。”

所谓两个道理,也就是穷人的道理与富人的道理。人类社会有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例如伦理道德。然而根据不同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不同的道理则很难相通。一个15岁的乡间少年能够明白“世上的道理有两个”,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已经能够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了。

(三)

彭德怀还对谢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兵之后,“一次大病,老婆总是哭。我说:哭什么,死了你嫁人。她说:你一个钱不剩,哪有饭吃。这是真理,原来人和人只有利害关系。”

因一件普通的口角,却引出了彭德怀关于“真理”的思考。彭之所言是否即真理,姑且不论,但却验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家往往是以抽象的方式诠释真理,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理则是具体的。(责任编辑 李晨)

贪 官 与 名 画

● 王春瑜

从现存传世画作来看,隋唐以来,妙手丹青,名画辈出。由于古代保存绘画的条件简陋,更由于水、火、兵、匪之厄,特别是战乱的洗劫,名画传世甚难。今天我们重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山河破碎风摆絮”的国破家亡时,人民仓惶逃难,转死沟壑,图书、文物——包括名画,或被偷被抢,或被迫弃如敝帚,任人践踏,碾作尘土,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因此,历代传世名画,数量甚稀,价值连城,往往成了不法之徒行贿、贪官污吏受贿的珍品。而巨贪大恶,更直接染指名画,巧取豪夺。即以明朝为例,史实昭昭,观之令人触目惊心。

明代成化(1465——1487)年间,镇守云南的太监钱能,贪赃枉法。他附庸风雅,却又不择手段,曾仗势欺人,先后用7000余两银子收买了沐府价值4万多两银子的文物。后来他调任南京守备,与另一个臭气相投的太监王赐,互相展示自己收藏的文物,并向南京不少缙绅炫耀过。明代嘉靖(1522——1566)年间陈洪谟(1474——1555)著《治世余闻》下篇卷2载谓:

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臣、周昉对镜仕女,韩滉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壶道文会黄筌聚禽卷,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轴,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在。

这些字画,不但都是晋、唐、宋物,而且从王羲之、王维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国宝。二柜书画在公堂展玩后,

“复循环而来”,究竟有多少柜,虽然不得而知,但即使一柜,已属珍贵之极矣。

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的严嵩(1480——1565),权倾朝野,贪赃枉法。他神童起家,善诗文,精通书画。其子严世藩,号东楼,短项肥体,眇一目,可谓人模狗样。但在严嵩大红伞的庇护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严世藩平步青云,做官做到工商左侍郎,是个肥缺。他“招权纳贿,贪利无厌,尤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蒐取不遗余力。他看中的名字画,往往假手总督、巡抚、按察使的势力,对字画的主人威胁、迫害,甚至倾家荡产,丢掉性命。后来被御史邹应龙、林润相继奏劾其罪,斩于市,籍其家。其父严嵩,因与嘉靖皇帝有着多年沉湎道教,共同修炼,妄图成仙的特殊关系,被打发回老家,寄食墓舍以死。值得注意的是,抄没严嵩家产的登记簿,被保存下来,冠名《天水冰山录》成了一本书,留传于世。本书铅印厚达140页,严嵩家产之多,不难想见。严嵩的抄家物资中,不仅有大量田产、金银财宝、绫罗绸缎,钟鼎彝器等等,并有大量名人字画,“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是骇人听闻。其中有唐吴道子《南岳图》、李思训《仙山楼阁》、阎立本《瀛州学士图》、王维《园光小景》、王维《辋川雪溪图》、黄筌《金盆浴鸽图》、周昉《杨妃出浴图》、戴嵩《牛图》、关仝《山水图》、荆浩《山水图》、宋徽宗《秋鹰》、宋高宗题王仲珪《梅》、董源《山水》、文与可《竹》、苏东坡《墨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米芾《人物山水》、苏汉臣《婴戏货郎》、李嵩《士农工商》、马远《翎毛》、范宽《晓景图》、元赵子昂《观音》并《美人图》、钱舜举《花草》、王冕题元人花鸟;明代文征明《潇湘八景》、文征明《拙政园十二篇》、祝枝山《文赋草圣》、沈周《画谱》等等,无一不是国宝。需要指出的是,这

些大家之作,有不少是多幅的,如阎立本《瀛州学士图》就有八轴,王维《园光小景》二轴,米芾《人物山水》竟达十三轴之多,马远《翎毛》也多达九幅。严嵩父子的贪得无厌,暴露无遗。这幅《清明上河图》,历经沧桑,流传过程,曲折离奇,后人演绎成为传奇《枕中秘》,又被改编为京戏、地方戏,我在少年时,即看过淮戏的改编本,至今印象深刻。经专家考证,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的原作,也正是当年严嵩被抄家后,归于内府的。我曾购得故宫复制、启功题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清明上河图》,仔细观察,并无严嵩父子的题识,或收藏章。想来当是严嵩父子垮台后,臭名远扬,被收藏者截去题识及印章。耐人寻味的是,画上有金朝灭亡后,遗老王礪先生的题诗,谓:“歌楼酒市满烟花,溢郭闾城百万家。谁遣荒凉成野草?维垣专政是奸邪!”固然他痛斥的是亡宋、亡金的统治集团的腐败分子,但严嵩父子,不也是实足的奸邪吗?!

清代的贪官,不少人也是眼睛盯着名人字画。乾隆时的巨贪和珅(1750—1799),这几年被无聊的电视剧,炒作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他贪污的数字之大,成了中国历史上贪官之最。据研究和珅的专家冯佐哲教授说:“正史、官书和档案中却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和珅全部家产的清单,有的只是零散的抄家史料。”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一包档案来看,仅和珅在承德一处的住所中,即有“大小字画 177 张”。和珅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能书亦能画,他收藏的这些字画,绝非等闲之物,是可以断言的。惜乎文献不足征,已经无从详细查考了。

遥看名画堕污泥——每当想到那些天才画家的杰作,成了行贿者交易的筹码,贪官的赃物,不禁扼腕浩叹。但是,“古月照今尘,今人欲断魂。”今天的贪官,比起古代贪官,人数之多、胃口之大、手法之狡猾、所呈集团化趋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媒体报道,不少已被判刑、处决的大贪官,赃物中均有名人字画。唯一不同的是,有些贪官不学无术,行贿者更胸无点墨,所送名人字画,常有赝品。值得注意的是,用名人字画行贿,是当今官场腐败的一大特点,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犹忆笔者前几年参加一次小型学者聚餐会,席上有京中著名老字号古董店鉴定字画专家说:

“近日有一港商来我店,问:有尺幅齐白石画否?我说:没有。只有一张小幅,有签名,未盖章,当是老人随手所画。画价十五万元。港商二话不说,付款后拿走,欢天喜地,并说:我请某要人题字,已送他一件古董,但觉得礼太薄了,所以才买此画,可惜不是大幅!”可以想见,这位港商送的古董,起码也值十五万,这位高官的区区几个丑字,即换来三十万元!近日我又在文友的餐桌上,听某著名女作家、也是艺术史专家说:她亲眼目睹某国画家卖画情景。此公尺幅八万元,尺幅以上二十万起价。有四个商人当场买画,但见画家桌上铺开四张宣纸,依次画山、水、草木、人物,纯属流水作业。商人当即在四张画前摆下四堆钱,画家目光一扫,看谁给的钱多,即在画上加画一塔、一鸟之类,扬长而去,其夫人立刻收钱,商人携画而去。他们都是将画送给高官的——常言道,天上掉不下馅饼。被赠画的高官,一转手,此画即可卖几十万元,揣进腰包,天衣无缝。他们利用权力为商人谋利,坑害国家,是不言而喻的。显然,当今官员——即使是部级高官,按其工资,是绝对买不起齐白石、张大千、范曾之类的画作的。他们如拥有这些画,或出售这些画,就应当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注意。目的只有一个:莫教贪官遁其形,莫让名画堕污泥!” (1月25日于老牛堂)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敬告作者

根据国家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刊物所登文章(包括读者来信)支付稿酬时,需全员全额申报个人所得税。为此,向我刊投稿的作者,请在稿件上注明您的身份证号码,以备稿件采用后支付稿酬时使用。

我刊今后刊登的文章,作者如未收到稿费,请将您的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财务室,电话:010-68525374,联系人:肖林。

请各位作者给予支持。

《炎黄春秋》编辑室

读者来信摘登(五则)

秉笔直书 感动读者

我是两三年前接触到《炎黄春秋》的,从此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期必读,读后必有新震撼和感慨。《炎黄春秋》以“勇者不惧、诚者有信”的精神,以求实的态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它不优柔寡断、不吞吞吐吐,不媚俗,不跟风,而是肯定、否定、揭露、批评,为广大读者劈开一片新天地,使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文化精神。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我们不但要记住历史,更要还历史以真面目。从上世纪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使不只一代人的思想与精神受到了创伤。特别是十年文革,对国家的民主政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使我们的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走了调的政治高于一切,统治一切,生产停滞,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应该对这些错误与失误进行彻底地反悔和揭露,让我们的人民从中醒悟和反思,知耻而后勇,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而重要的是,如果更多的不知真相,后人们甚至无从哀之。

我是出生在50年代中期的那代人,文革开始时10岁左右,正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命运跟着文革走,但对于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从《炎黄春秋》所刊登的文章中,才知道大跃进、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荒唐、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情,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在那些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被愚弄,文化被

摧残,人性被践踏的情景令人发指,发人深省。我相信有和我一样、并比我出生更晚的人对那些历史事件的了解是浮浅的,不深刻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不可能了解和理解更深层次的事实真相。我们需要像《炎黄春秋》刊登的文章,以铁的事实,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件,用翔实的资料说明那些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

文革已经耽误了几代人,民主制度被践踏带给人们的是是非混乱、黑白颠倒,其影响之深导致了至今有些人说话察言观色,写文章媚上奉迎,评价历史仍欠真实,误导读者。再不能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年高中毕业还自信地认为,国民党军队没有抗战打日本,等抗战胜利了他们才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吃(夺胜利果实)。难道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到中学不都受的这样的教育吗?而且至今我发现我们的有些教科书上写的东西仍与事实有出入。文化教育的不诚信,怎么能培养出诚信的青少年和诚信的国民。

我庆幸有《炎黄春秋》,它用事实说话,最能感动读者。我每次读后把它推荐给朋友和上大学的儿子,希望他从中了解历史真相,得到启迪,从而提高辨别是非能力。

古人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允许人们说真话,说实话;允许不同见解、不同观点的人发表看法,才能“百家争鸣”,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加多元,使我们的哲学领域充满生命力,使我们的政治更加民主与文明。人民已经厌倦了一言堂,厌倦了言不由衷,厌倦了遮遮掩掩,厌倦了被欺骗和愚弄。人民盼望思想的春天的到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国凤

《炎黄春秋》在云南师大拥有众多的读者

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同年已七旬的余斌老师闲谈大家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就反腐败中的监督机制,余老师引用任仲夷同志说的“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我立即惊叹这句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并想进一步了解任老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余老师告诉我,可向离休教师段德龙借阅第11期的《炎黄春秋》。于是我当天就如愿以偿了。我痛感与贵刊相识恨晚。贵刊已经步入“青年时代”(创刊已15年了),而我却孤陋寡闻。我专门走访了我们学校离退休工作处负责同志,知道从2004年至今,该处坚持每年订阅90份(本)《炎黄春秋》,分发给离休教职工和校级领导,并广泛传阅,大家爱不释手,一致认为贵刊“比较实在”,实践了“述过去,思未来”(详见2005年贵刊《新年献词》)。我从贵刊中得到了迫切需要的启发和教益。为了方便好好研读贵刊,我借阅并复印了2005年的16篇、2006年的24篇重要文章,主要涉及政治体制和“三农”问题,再挑出6篇文章,复印了寄给我的学生——酷爱学习和研究的中学政治课教师,得到他的共鸣。今后我一定要把贵刊当作我的益师良友,并大力宣传贵刊,促进科研工作。

衷心祝愿贵刊越办越好!

云南师大经济政法学院 李文云

民先总队第一任队长是敖北枫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中说,民先总队的队长是李昌。这个说法对,但不全。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北枫,当时是东大学生领头的。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李昌任队长后,北平市委把敖北枫调任西城区委书记。事情是“一二·九”运动有无党的领导引起的。我向敖北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当时北平

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如华北局的薄一波、刘子厚都是搞军运的)。一个是学运,学运的领导,由于地下党是多头的,除北平工委高锦明组织的一部分学校外,黄河赈济委员会的周小舟也组织了一部分学校。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周 明

一段文字表述有误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我对右派的内疚》一文提到了“1957年4月毛主席在《1957年夏季形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段文字表述有误。一是该报告的时间为7月,不是4月。4月属春季,整风尚未开始。二是报告的主要内容,不是动员鸣放,给领导提意见,而是“反击右派”。这与“毛主席的伟大光明胸怀”联系不上。4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国各报均在5月1日刊登,如果说这个文件体现了党的光明伟大,还是符合实际的,但遗憾的是并未照此执行。

于俊沂

几点补正

阅贵刊今年第1期,倍感所发文章一如既往的思想性、可读性均强。现仅对几篇文章中的不实、不妥之处予以补正。《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一文中:“1979年1月1日,唇枪舌战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实际在30年里,中美两国不仅唇枪舌战,其军队还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提及,侯外庐比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年轻约10岁。经查,郭、范分别长侯11岁和10岁,翦、吕则各长侯5岁与3岁。《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中称:“上世纪60年代,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广积粮,不称霸”。应为:在文革期间提出了一个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王正纲

欢迎订阅2007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

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插曲”

为争取读书机会引出的离奇经历

“中国的端纳”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